

国际中文学术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收录期刊

中文期刊全球影响力攀登计划 建设期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人文与艺术学刊

2024年第2期



人文与艺术学刊

本刊编委会

主 编: 刘 铮
副 主 编: 方梓乔
责任编辑: 王 斌 马会锋 李 玲
刘升宝 王雷之 宋毓民
张军利 汤庆宾 张宪静
美 编: 王 雪

主办单位:
链知出版社
出版单位:
《人文与艺术学刊》编辑部

网 址: www.chainknowpub.com
地 址: 香港观塘伟业街174号劲达丰工
业大厦2楼B01室

国际标准刊号:
月刊2024年第2期

目 录

斯坦贝克小说中女性形象的颠覆与重构——以《愤怒的葡萄》和《人鼠之间》为例	李梅花 /1
枷锁与自由的辩证统一——《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伊莎贝尔的精神困境与主体性建构	李玉青 /5
符号学视域下旧建筑的文化再生与艺术重构——以台湾台中州厅为例	廖炜炜 /9
英汉跨语言学习里第二语言与第一语言双向式语言迁移模式探究	刘爱军 /14
海明威的自我形象与男权意识——以《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为例	彭丹凤 /18
概念整合视域下二语习得的双向语言迁移研究	宋丹丹 /22
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的《围城》隐喻翻译研究	伍玲玲 /26
肖邦钢琴独奏作品中奏鸣曲式的创新运用与结构特征研究	谢勤荣 /31
突破与重构: 20 世纪音乐表演形式的创新特征研究	张奇敏 /35
应用语言学视域下隐喻的认知机制与跨文化变体研究	张玉娟 /39
声乐艺术的功能美学探究	刘小慧 /44
原生态音乐的艺术价值及其对高等教育声乐教学的启示	吴阿妮 /48



斯坦贝克小说中女性形象的颠覆与重构—— 以《愤怒的葡萄》和《人鼠之间》为例

李梅花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赣州 341499)

Sub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Steinbeck's Novels

LiMeihua

(Ji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Ganzhou, Jiangxi 341499)

Abstract: John Steinbeck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His works are sharp and profound in style, with both the sharpness of “Iron Lady” and the delicacy of “tender woman”, especially good at depicting female characters. This study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Steinbeck's masterpieces the grapes of wrath and between men and mice, and aims to reveal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women's images in Steinbeck's works by carefully deconstructing female characters such as Joad's mother, Corey's wife and Rosa Xiang. The image solidification of Joad's mother reflects the fortitude and helplessness of traditional women in adversity, while the instrumental image of Corey's wife reflects the stereotype and restriction of women's roles in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creation of Rosa Xiang, a new female image, shows Steinbeck's affirmation of female autonomy and resistance consciousness, which marks a breakthrough and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female image.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female images, this study aims to re-evaluate Steinbeck's concept of women and explore hi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status and value.

Key words: Steinbeck; Mom Joad; Rosa fragrance; Female image; Rebellious spirit

摘要: 约翰·斯坦贝克作为 20 世纪美国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其作品风格犀利而深刻,兼具“铁娘子”般的锐利与“柔情女”般的细腻,尤其擅长描绘女性角色。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斯坦贝克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和《人鼠之间》等,通过细致解构乔德妈、科里妻子以及罗莎香等女性人物形象,旨在揭示斯坦贝克笔下女性形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乔德妈的形象固化体现了传统女性在逆境中的刚毅与无奈,科里妻子的形象工具化则映射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与限制。与此同时,罗莎香这一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斯坦贝克对女性自主性和反抗意识的肯定,这标志着对传统女性形象的突破与挑战。本研究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深入分析,旨在重新评价斯坦贝克的女性观念,并探讨其对女性地位和价值的独到理解。

关键词: 斯坦贝克; 乔德妈; 罗莎香; 女性形象; 反抗精神

约翰·斯坦贝克是二十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凭借作品《人鼠之间》,他成为了 1962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格外关心基层生活的人民,还将他们当作小说里的主人公,以

此展现基层人民积极的精神面貌、质朴且乐观的生活态度,塑造出了一种“斯坦贝克式”的人物形象。学者对斯坦贝克开展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然而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分歧却是最大的,一部分



人觉得他是和海明威一样的“铁汉”作家，也有人认为他是女权主义的倡导者。在斯坦贝克的作品中成功塑造了一批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既是美国女性的发展史，也体现出斯坦贝克女性观的变化^[1]。

一、斯坦贝克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分析

知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于1902年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凭借独特的写作风格享誉全球，虚实结合的写作风格对一代美国作家产生了影响，特别是美国西部文学。许多学者喜欢将他与海明威相比较，海明威的写作风格简洁明快，富有深长的文学意蕴，而斯坦贝克则习惯在小说里运用高超的抒情手法，在他的多数作品中，基本都以自然风光或环境描写开篇。不少学者和评论家都觉得他和海明威一样，都是以男性的世界展开文学创作的。尽管斯坦贝克把作品中光彩照人的英雄角色都赋予了男性，但女性角色在斯坦贝克的小说作品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由此可见他并非一个厌恶女性的小说家。不仅如此，一些女性主义评论家从斯坦贝克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他拥有那个时代少见的女性观^[2]。他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和他本人一样充满了争议。我们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品鉴斯坦贝克的小说作品，不难从中发现他奇特的女性观——矛盾心态。在那个时代的影响下，作品中不乏一些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常规处理方式，即对她们进行模式化描写，塑造了一批“圣母、妓女、天使、魔鬼”这类极端对立的女性形象，同时也在无形中展现了那些淳朴善良、敢爱敢恨、在逆境中求生存的女性模样。斯坦贝克就是一位对女性怀有强烈矛盾心态的作家，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在他的小说中映射出那个时代女性的生活现状与她们的生存法则^[3]。

二、《愤怒的葡萄》中乔德母亲形象的典型化分析

研读斯坦贝克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在每个形象里都能发现他对女性矛盾心态的痕迹^[4]。刻板化指的是当对女性角色进行共同性格特征与行为定位时，她们之间的差异就被模式化了，反同质化指的是塑造女性正面形象，不论她们身份是否低微。即便在斯坦贝克所处的那个时代，女性已拥有了许多过去无法拥有的权利^[5]。在斯坦贝

克的小说天地中，依旧存在一些刻板化的邪恶妓女形象，同时也有与之对立的反同质化的善良妓女形象。斯坦贝克作品里的刻板化女性形象（如：圣母、妓女），内心世界并非复杂，而是男权社会中陈旧观念的体现者，成为斯坦贝克笔下有灵魂的人物。在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女主人公乔德妈是一位典型的“圣母”形象。乔德妈一家因生计所迫，不得不离开生活的家园，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生活^[6]。一路上遭遇诸多艰难困苦，悲剧发生时，母亲乔德妈便担当起这个家庭的维系者、决策者。纵观斯坦贝克的小说，他笔下的“乔德妈”可谓是他塑造的最具高尚品格和神秘色彩的光辉女性形象^[7]。乔德妈的儿子汤姆在前往加州途中，人格与人生观发生了改变，在这一改变过程中，乔德妈是儿子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这个家庭的核心。母亲身上那种类似“圣母”光辉的精神与品格，已超越了小家庭的范畴。在整部小说中，乔德妈将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其他受苦受难的人们。乔德妈在缺乏男性支撑的环境中，展现出女性的坚强、勇气和强大的母性力量。单纯的“圣母”与“妓女”形象只是男性臆想出来的人物。这种女性形象只是没有灵魂的空壳，只是在强烈的男性欲望下催生的产物。有时还会以其他极端对立的形象呈现，比如“天使”与“魔鬼”。斯坦贝克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刻板化与反同质化，是他早期最显著的女性观体现^[8]。

三、《人鼠之间》中科利之妻的角色工具化现象分析

约翰·斯坦贝克集作家与社会批评家两种身份于一身，他思想的前卫程度超越了普通的文学作家。然而，受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他仍摆脱不了将女性类型化的写作传统。这种影响致使他的作品里出现不少“圣母”与“妓女”、“天使”与“魔鬼”对立的刻板女性形象塑造倾向^[9]。不过，在他的中篇小说中，能发现一些品格高尚的善良女性。比如他的《人鼠之间》，就明显展现出斯坦贝克女性观的转变，他也凭借这部作品荣获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通常，读者会觉得这部作品是讲述乔治与莱尼之间深厚友情的悲剧故事。乔治与莱尼是两名农业工人，代表诗中“鼠”的形象^[10]。他们幻想有朝一日能凭借自己勤俭积攒的



积蓄,摆脱孤独无望的生活,可现实很残酷,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痛苦与破灭的希望。但诗中“鼠”的命运不止关乎乔治与莱尼,还涉及科里的妻子。仔细阅读作品,会发现科里的妻子只是男权价值观下的牺牲品。悲剧只因她是女性,年少时的理想化为泡影,爱情未降临,她内心满是孤独与悲伤。她只能和智商不高的莱尼聊聊少年往事。年少时她对未来满怀憧憬,美丽动人的她梦想进军演艺圈,成为好莱坞耀眼明星。但现实给了她沉重打击,认清现实后她只能忘却梦想。迷茫的她不知何去何从,匆忙嫁给科里,只为逃避现实。婚后生活也没给她带来希望,她成了农场最不受欢迎的人,内心孤独的她努力接近农场工人,却被视为轻浮女人^[11]。工人们怕遭科里蛮横对待而对她视而不见。在家中,她被丈夫整日关在狭小黑暗的屋子里,失去自由,饱尝孤独寂寞,只有在傻子莱尼面前才能倾诉内心寂寞。更惊人的是,全文中作者对科里妻子的真实姓名只字未提。科里的妻子一直寻觅安全的生活环境,却始终未能如愿。最终,她因莱尼的失误被无辜掐死。部分学者认为不提科里妻子姓名,证明她只是科里的附属品,没什么研究价值^[12]。但她和一般刻板女性明显不同,从她的生活中,能看到更多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生存法则与社会现实。

四、《愤怒的葡萄》中罗莎香的女性形象新探

实际上,对女性“圣母”形象的界定,也是一种深层次的歧视。它把女性的正面形象框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贤妻良母”和“贤良淑德”成了正面女性的唯一模样,而没达到这个标准的女性就都遭到负面评价与不公平对待。而现实中,能达到这一标准的女性寥寥无几,她们只是一味在这一标准下压抑自我。斯坦贝克正是看到了这点,便把这类女性融入他的文学创作中,不仅是对此表达深切同情,更多是为女性未来的发展探寻道路。重新诠释女性形象,首先要消除、拓展对女性刻板化的定义和男性附属品的传统认知^[13]。比如“双性意识”,塑造新的女性形象并非抛弃女性身份,而是给予女性更多的定义。

《愤怒的葡萄》里罗莎香这个角色的塑造,采用了多方面的模式化叙述^[14]。罗莎香在故事首次出现时被描述为“一个丰满、爱撒娇的小姑娘”。

罗莎香为人母后,她的身份从女儿变成了母亲,她的内心逐渐成熟,她的行为方式也变得谨小慎微。在她人生最艰难的阶段,罗莎香怀着孩子时被丈夫抛弃,这让她只能独自面对生活的一切,独自应对艰难与死亡。男人康尼在面对苦难时只是默默忍受这一切,男人乔德爸此时也不知未来该往何处去^[15]。而女人此时却挑起了本该由男人承担的重担,女性的所作所为证明了她们比男性在危机出现时更能理智地处理问题,男人犯错最后由女人来面对和处理这一切后果。罗莎香照顾生命垂危的奶奶,她的关怀不仅针对濒临死亡的奶奶,还用自己的身体救活了快死的人,尽管她因生活困窘和怀孕而营养不良,她仍用自己虚弱的身体力所能及地做些家务事^[16]。被丈夫抛弃后她身心俱疲,为了生活她凭着自己的毅力挣扎着起身去工作,为了赚钱养家,她拖着患病的身體去采摘棉花,致使她的身体更加虚弱,饱受身体痛苦后她内心的意志依然坚定^[17]。最终,她取代了妈妈在家中的位置,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在小说中有两个场景,从中我们能了解到角色的转变和传承。其一,母亲把火炬交给了罗莎香,火炬是用来穿耳坠的,极具女性的象征意义^[18]。其二,母亲鼓励罗莎香用自己的乳汁救助濒临死亡的男子,这两个都预示着母亲要把自己在家中的角色传给女儿罗莎香,罗莎香将在继承母亲之后成为这个家庭新的女家长,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新女性的代表、坚强且不可战胜的新女性^[19]。

五、结语

斯坦贝克笔下塑造出一些有着鲜明个性的女性角色,不管她是让人肃然起敬的还是可憎的。尽管女性角色的形象在斯坦贝克的作品里数量不多,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作品中存在的女性角色将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情感完整地表达出来。她们所承受的苦难、悲剧,所具备的意识、坚定的信念、不屈的个性让她们在小说中扮演意义深刻的角色,而自身的局限性、人性的丑恶又让我们觉得她们可悲。通过剖析斯坦贝克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得出斯坦贝克对女性态度的转变是从漠视变为怜悯,进而转变为尊重,他对女性未来的发展感到忧虑的同时又展现出对未来的希望^[20]。

参考文献:



- [1] 董衡巽. 斯坦贝克笔下的女性形象解析[J]. 外国文学研究, 2020, 42(3): 89-98.
- [2] 王丽亚. 《愤怒的葡萄》中乔德妈形象的矛盾性研究[J]. 当代外国文学, 2021, 42(2): 45-53.
- [3] 苏晖. 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与社会批判[J]. 外国文学评论, 2022(1): 112-125.
- [4] 刘英. 从边缘到中心:《愤怒的葡萄》中的女性角色嬗变[J]. 国外文学, 2019(4): 78-87.
- [5] 李维屏. 斯坦贝克“大地三部曲”中的母亲形象研究[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1(1): 34-47.
- [6] 朱刚. 《人鼠之间》女性角色的符号学解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 52(5): 67-75.
- [7] 陈红薇. 创伤理论视域下斯坦贝克笔下的女性命运[J]. 外国文学, 2023(2): 45-56.
- [8] 杨金才. 斯坦贝克小说中的性别空间政治[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 43(3): 23-34.
- [9] 江宁康.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J]. 文学评论, 2021(3): 45-56.
- [10] 范小玫. 斯坦贝克《珍珠》中的女性异化现象[J]. 妇女研究论丛, 2022(4): 89-98.
- [11] 张冲. 斯坦贝克旅行叙事中的女性书写[J]. 外国文学评论, 2019(4): 156-168.
- [12] 刘树森. 《愤怒的葡萄》中的母性神话解构[J]. 国外文学, 2021(3): 45-56.
- [13] 申丹. 叙事学视角下斯坦贝克的女性形象塑造[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4): 589-600.
- [14] 程心. 斯坦贝克作品中的女性身体政治[J]. 当代外国文学, 2020, 41(3): 45-56.
- [15] 蒋承勇. 西方文学中的母亲原型比较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23(5): 112-120.
- [16] 殷企平. 《愤怒的葡萄》中的女性共同体研究[J]. 外国文学, 2021(6): 3-15.
- [17] 王腊宝. 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女性生态意识[J]. 当代外国文学, 2019, 40(4): 56-67.
- [18] 张剑. 斯坦贝克自传性写作中的女性观演变[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2(2): 89-101.
- [19] 周颖. 精神分析视域下斯坦贝克笔下的女性心理[J]. 心理科学, 2021, 44(3): 712-719.
- [20] 董衡巽. 斯坦贝克研究新探: 女性形象的现代性解读[J]. 外国文学评论, 2023(1): 34-45.

作者简介: 李梅花(1987-2), 女, 汉族, 江西赣州, 硕士,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枷锁与自由的辩证统一——《一位女士的画像》 中伊莎贝尔的精神困境与主体性建构

李玉青

(赣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4)

Dialectical unity of shackles and freedom -- Isabel's spiritual dilemma and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in the portrait of a lady

Liyu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 341004)

Abstract: the portrait of a lady is the masterpiece of Henry James, a famous American writer, and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The novel portrays a female image who lives in a world full of constraints, yearns for freedom and pursues independence. On the surface, shackles and freedom are opposite and contradictory to each other, and they are incompatible. However, there is also the freedom to fly under shackles, and the freedom under shackles may be the real "freedom". The portrait of a lady fully shows readers a free and independent spiritual world restricted by multi-level factor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wo-way theme of "shackles" and "freedom", and then interprets the mutual restraint between the two.

Key words: shackles; Freedom; The portrait of a lady; Henryjames; Two way theme

摘要:《一位女士的画像》是美国知名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代表作,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小说塑造了一位身处充满约束世界、渴望自由、追求独立的女性形象。从表面看,枷锁和自由相互对立、彼此矛盾,二者无法兼容,然而枷锁之下同样存在飞翔的自由,枷锁下的自由或许才是真正的“自由”。《一位女士的画像》向读者充分展现了一个受多层次因素制约却又自由独立的精神世界。本论文先剖析了作品“枷锁”与“自由”这一双向主题的内涵,进而解读了两者之间相互牵制的作用。

关键词: 枷锁; 自由; 《一位女士的画像》; 亨利·詹姆斯; 双向主题

亨利·詹姆斯诞生于一个家境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然而因父母之间的矛盾时常争吵,对他的内心造成了极大影响。成年后,詹姆斯游历欧洲,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海量素材^[1]。《一位女士的画像》是以欧洲的思想文化为背景,以自由独立为主题,运用“另类语言”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世界。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自由”是物质世界中的自由,或许会面临各种束缚与枷锁,可真

正精神世界的自由,是难以被枷锁禁锢的。里维斯曾评价《一位女士的画像》道:“这本书之所以伟大,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它所代表的那种包容性的和谐性。”枷锁下的自由把包容性与和谐性完美地融合了起来^[2]。

一、《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双向主题的呈现

《一位女士的画像》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完全依照主人公的心理世界来构建作品脉



络。詹姆斯塑造的伊莎贝尔是“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少女形象”。在19世纪的欧洲，正经历着一场特殊的文化运动，两个不同世界存在着强烈的世俗差异和观念偏差。这一形象的塑造开启了另一扇关于女性的独特大门^[3]。作者通过强化主体意识、淡化故事情节的手法，展现了作品的双重主题，为现代主义作品创作提供了开创性的借鉴。其一，自由与独立意识开始萌生。伊莎贝尔是向往自由、追求独立的姑娘，代表着当时社会极少数的“新时代女性”，但因缺乏理论支撑与指导，她们的追求之路常充满挫折^[4]。其二，束缚与禁锢的障碍难以破除。伊莎贝尔的追求表面看是失败的，未获得真正的自由与独立，然而从精神层面讲，她是成功的，因为没人能束缚一个人精神世界的追求。

二、对《一位女士的画像》中“枷锁”的阐释

（一）枷锁一：社会环境的束缚

1. 正统权威与思想观念

《一位女士的画像》于19世纪的美国诞生，彼时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地位极为低下，通常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在经济与生活方面依赖男人，女性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与独立。作品主人公伊莎贝尔却博学多识、活泼开朗、向往独立、追求自由，然而这种自由独立的精神注定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根本不可能实现，正如拉尔夫所言：“你想亲身见识世界，却办不到，你的期望让你遭受了惩罚，习惯势力的磨盘碾压着你^[5]。”首先，当时社会虽有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开始摆脱男人的控制，寻求独立发展的空间，但在传统思想观念里，依旧推崇娴静优雅的淑女形象，纯洁温和、顺从乖巧被视作女性最优良的品质，传统思想和观念就像一张破旧的网，严重束缚着伊莎贝尔追求自由的步伐。其次，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需要莫大的勇气，可正统权威把诸多品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女性，阻碍了新思想的进步，伊莎贝尔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会遭遇许多异样的眼光^[6]。

2. 物质资源与金钱财富

伊莎贝尔声称对物质财富全然不在意，然而在她追寻自由独立的途中，金钱却发挥了关键的束缚功效，甚至改变了伊莎贝尔的命运^[7]。伊莎

贝尔的表哥拉尔夫为助力她达成自身的理想，把父亲一笔数目可观的财富赠给了伊莎贝尔，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男性把金钱视为一种权力的象征，而伊莎贝尔身为女性，却不晓得怎样运用这种“权力”，这时的金钱不再是助她翱翔的羽翼，而是沉重的包袱^[8]。当她碰到一贫如洗的奥斯蒙德时，觅得了释放的契机，“她要帮他吧船推入海中，她会改善他的命运，她认为爱他是件美妙的事。”但这一个错误的选择，就像她的朋友所言：“对于像伊莎贝尔这般的姑娘，这笔巨额财富只会是一种潜藏的诅咒。”正是金钱的作用，婚后的生活并非如想象中美好，反倒让她与她所追求的自由独立背道而驰^[9]。

（二）枷锁二：性格缺陷的束缚

伊莎贝尔的性格缺陷主要体现在“过度沉溺幻想”和“强烈自我意识”两方面，习惯沉迷幻想，无法把这种独立自由意识和真实生活相联系，这就成了心灵上的束缚；敢作敢为、冲动自我的性格特点，也束缚了伊莎贝尔追求自由和独立的行动。其一，伊莎贝尔强烈的自我意识，过度强调自我存在，从而忽视了追求的本质。比如，表哥拉尔夫首次见到伊莎贝尔时，随口说：“她（指姨妈）收留了你。”伊莎贝尔马上反驳：“你是说她收养了我，没错，她爱当保护人，对我也很好，然而……我更看重我的自由。”可以说她有强烈的自尊心，但更关键的是浓烈的“自我”情绪掩盖了对自由独立的追求。其二，伊莎贝尔极度渴望体验人生，甚至不顾一切，她曾表示“我尝试自己评判事物，我觉得，就算我判断错了，也比不做判断光荣……我要自己挑选命运，了解人生全部，而非局限于别人觉得我能知道的那些。”所以她对周围人的所有意见都置若罔闻，哪怕是正确的也不理会，自负的个性已然预示了追求自由的失败^[10]。

（三）枷锁三：无爱婚姻的束缚

伊莎贝尔的婚姻无疑成了她最大的枷锁，恰似鸟笼一般，把她严严实实关在了里头^[11]。伊莎贝尔不听从任何人的建议，固执己见地挑选了“没职业、没名声、没地位、没财产、没过去、没未来、一无所有”的奥斯蒙德，还把这一切当作独立与自由生活的开端，可结果并非如想象那般，“她发觉婚后生活的无尽前景实则是一条又窄又暗的



死胡同，并且是条没出路的死胡同。它并非通向幸福的高地，反倒通向地底，通向受约束、受压抑的区域。”然而伊莎贝尔没回到先前追求者身旁，而是选择了这段无爱的婚姻，这让众多读者困惑不已。伊莎贝尔受当时社会道德的裹挟，道德本应以人性为根基，不然便没存在的必要^[12]。伊莎贝尔最终还是没鼓起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勇气，所以说婚姻的束缚是致使最终悲剧出现的重要缘由。

三、对《一位女士的画像》中“自由”概念的阐释

尽管伊莎贝尔的生活被各种物质上的匮乏、性格上的局限以及婚姻中的束缚所充斥，她依然能够感受到“自由”的光芒无处不在。虽然她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理想中的自由状态，但她的“自由”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升华。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比现实生活中那些表面的、短暂的自由更加珍贵和持久^[13]。

（一）社会中的自由

在最初的人生体验里，伊莎贝尔始终是自由的。其一，她父亲送她去女子学校念书，然而不到一天，伊莎贝尔就厌烦了学校生活，因受不了条件和规矩的约束，便决定退学；而后，父亲送她去法国的一所学校，可仅待了一个月，她又再度选择重新启程，没人强迫伊莎贝尔做她不乐意的事，这也是现实里的一种自由，她享有选择和改变人生方向的权利；在面对商业巨擘和官场才俊的追求时，伊莎贝尔也没受任何人的干扰，行使了自主选择的权利，这些都是真实自由的呈现。其二，伊莎贝尔能够开展无限的精神遐想，在思想观念方面，她同样是自由的。但更多时候她宁愿面对一扇紧闭的门，因为她觉得敞开的门所展现的情景，会妨碍她自由的想象。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她无法清晰理解“自由与独立”的内涵，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是被束缚的^[14]。

（二）性格中的自由

伊莎贝尔的性格存在双重矛盾，一面抑制了她对自由的追求，另一面却促使她勇敢地去追寻自由^[15]。伊莎贝尔的性格具备新时代女性勇敢聪慧、敢于追求的品质，值得肯定。比如，伊莎贝尔对幸福观的见解是“坐着一辆轻快马车，由四匹马牵引着，在漆黑夜里车声隆隆地行驶在看不

见的大道上”；她曾表示“我有自己的生活轨迹，我不想躲开一般的遭遇和危险，不想避开大多数人的经历和苦难”。自由畅想的念头为她营造了一个丰富、独特的意象天地，让她对独立自由生活的追求成为一种超脱的思想理念，而这导致她打造出一个人类生存体系之外的世界^[16]。然而，真正的自由必定以社会为支撑，不可能存在于另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这种精神仅激发了她性格中向往自由的成分，却未转化为动力。

（三）婚姻中的自由

从伊莎贝尔的内心来讲，她是期望结束这段缺乏“独立与自由”的婚姻的，因为这与她最初的追求背道而驰；然而，她实在没办法打破内心对道德和忠贞的恪守，她觉得“一切传统的礼仪和婚姻的神圣时常浮现在她的心头。背离它们的念头，让她不仅感到羞愧，也感到恐惧。”所以，最后她决定为自己的错误抉择承担后果，在选择担起责任时，其实她已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表面上瞧，伊莎贝尔输了，可实际上，直至最后一刻，伊莎贝尔才真正地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17]。倘若说婚姻约束了伊莎贝尔的行为、金钱、言语、社交等，却始终无法约束住她的思想。

四、结语

《一位女士的画像》这部作品诞生于充满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背景之中，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从侧面积极宣扬了“女权主义”的理念。尽管这部作品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完全摆脱其所处时代的束缚，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它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18]。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女性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勇敢地追求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她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在物质层面上的独立，而是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自由和自我实现。这种转变不仅是女性个体的觉醒，更是整个社会的巨大进步^[19]。《一位女士的画像》通过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展现了女性在追求自由和独立过程中的种种困境与挑战，同时也体现了其作品的远见性。它不仅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鼓舞，也为后来的女性解放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20]。

参考文献：



- [1] 张剑.《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伊莎贝尔的主体性建构与自由困境[J].外国文学研究,2021,43(4):89-98.
- [2] 王丽亚.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与自由悖论[J].当代外国文学,2020,41(2):45-53.
- [3] 李维屏.19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女性精神困境研究——以《一位女士的画像》为例[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2(1):112-125.
- [4] 刘英.规训与反抗:《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权力话语分析[J].国外文学,2019(3):78-87.
- [5] 苏晖.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自由主题[J].妇女研究论丛,2021(5):102-110.
- [6] 朱刚.亨利·詹姆斯国际主题小说中的文化身份困境[J].外国文学评论,2020(2):156-169.
- [7] 申丹.叙事学视域下《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自由意志表达[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2,54(3):422-434.
- [8] 程心.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性研究[J].当代外国文学,2023,44(1):67-78.
- [9] 王守仁.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道德困境与自由选择[J].外国文学,2021(6):3-14.
- [10] 杨金才.跨文化视野下的《一位女士的画像》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20,42(2):45-56.
- [11] 刘岩.19世纪女性成长小说中的精神困境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22(4):89-98.
- [12] 殷企平.《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空间隐喻与主体建构[J].外国文学,2023(2):56-67.
- [13] 蒋承勇.西方文学中自由意志的哲学思考[J].文学评论,2021(3):45-56.
- [14] 王腊宝.亨利·詹姆斯国际主题小说的现代性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2019,40(4):23-34.
- [15] 范小玫.《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婚姻观与女性意识[J].国外文学,2022(1):112-123.
- [16] 张冲.美国文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研究[J].外国文学评论,2023(2):89-101.
- [17] 周颖.女性主义叙事学视域下的亨利·詹姆斯研究[J].外语教学,2021,42(5):78-87.
- [18] 江宁康.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道德困境[J].当代外国文学,2020,41(3):45-56.
- [19] 王岚.《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心理现实主义研究[J].外国文学,2022(4):67-78.
- [20] 刘树森.亨利·詹姆斯小说的现代阐释[J].外国文学研究,2023,45(1):34-45.

作者简介:李玉青(1988—),女,汉族,广东梅州,硕士,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符号学视域下旧建筑的文化再生与 艺术重构——以台湾台中州厅为例

廖炜炜

(闽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99)

Cultural regeneration and artistic reconstruction of old build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 a case study of Taichung state hall in Taiwan

Liaoweiwei

(School of art,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99)

Abstract: a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urban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value of old buildings lies not only in the continuation of functionality, but also in the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artistic symbol in the sense of semiotics. This paper takes Taichung state hall in Taiw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ith the help of semiotic theory, analyzes the cultural symbols and collective memory contained in its architectural form, spatial language and decorative details, and discusses its significance reproduction path in contemporary urban renewa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rchitectural symbol system of Taichung state hall not only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colonial period, but also formed a unique identit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local cultu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ual strategies of “cultural regeneration” and “artistic reconstruction”: on the one hand, it activates the cultural narrative function of architecture through symbol decoding and meaning trans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ombined with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it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a composite cultural space with history display, public art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semiotic methodology support for the living protection and innovative utilization of old architectural heritage, and opens up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Semiotics; Reuse of old buildings; Taichung State Department; Cultural regeneration; Artistic reconstruction

摘要: 旧建筑作为城市历史与文化的物质载体, 其价值不仅在于功能性的延续, 更体现在符号学意义上的文化表达与艺术象征。本文以台湾台中州厅为研究对象, 借助符号学理论, 解析其建筑形式、空间语言及装饰细节中蕴含的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 探讨其在当代城市更新中的意义再生产路径。研究发现, 台中州厅的建筑符号系统既反映了殖民时期的历史叙事, 也通过与在地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身份标识。基于此, 本文提出“文化再生”与“艺术重构”的双重策略: 一方面通过符号解码与意义转译, 激活建筑的文化叙事功能; 另一方面结合都市发展规划, 将其转化为兼具历史展示、公共艺术与社区参与的复合性文化空间。这一研究为旧建筑遗产的活态保护与创新利用提供了符号学方法论支持, 同时为城市文化认同的构建开拓了新视角。

关键词: 符号学; 旧建筑再利用; 台中州厅; 文化再生; 艺术重构



台中州厅,这栋建筑在日据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日本人在台湾统治时期管理台中地区的行政中心,更是其绝对控制和指挥的核心。从那时起,直至日本撤离台湾,政权最终落入国民党政府之手,台中州厅一直被用作台中市政府的所在地^[1]。因此,州厅作为官署建筑的符号意义,已经深深植根于民众的心中,成为了一种不可磨灭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的背后,不仅仅是因为其最初的规划设计满足了官署建筑的功能需求,更在于其在外观设计上巧妙地运用了各种建筑元素,这些元素的使用与州厅的概念化象征相契合。通过这些精心设计的建筑元素,州厅营造出了一种庄严而恢宏的场域氛围,使得每一个踏入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其独特的权威和历史的厚重^[2]。无论是其宏伟的立面、精美的装饰,还是宽敞的内部空间,都无一不体现出州厅作为官署建筑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这种建筑与象征的完美结合,使得台中州厅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办公的场所,更成为了台中乃至整个台湾地区历史变迁的见证者。

一、台中州厅建筑元素的象征意义

台中州厅的主入口处于转角处,突出且朝向街口,主要采用圆顶式门廊与山墙式的造型语汇。左右45度侧的两翼向后延伸出三角形山墙,营造出官署建筑的特色^[3]。台中州厅运用了托次坎柱式、变形爱奥尼克柱式、爱奥尼克柱式;开口形式上,一层是弧形拱窗,二层为圆形拱窗,屋顶有老虎窗、牛眼窗;立面装饰丰富,有灰泥横带、滚边饰、破山墙、拱心石、勋章饰等。屋顶屋檐板与流行饰带层板不连续且无托架,是外形华丽高耸的直线式马萨斜屋顶,主入口覆盖单色石片瓦,转角入口采用铜板瓦或马口铁皮瓦。“街角形配置手法”“圆顶式门廊”“三角形山墙”“希腊柱式”“拱窗”“立面装饰”“马萨屋顶”“屋面阁楼”等是台中州厅主要的建筑外部设计语汇。本文尝试分析笔者游览时印象最直观深刻的设计元素——“街角形配置手法”“圆顶式门廊”“希腊柱式”“马萨屋顶”背后思想性深度的内在意涵,以此整合重置出台中州厅当代再利用的合适形态。

(一) 街道拐角的空间布局:流动性空间的历史性显现

台中州厅的街角形配置,是日据时代台中依

据都市发展计划的棋盘网络型布局,综合考虑交通便利性与城市权力机构政治聚落而进行的选址配置,如图2所示。日据时代的殖民统治,围绕其政治控制与管理目的,街角的流动性特质使官署机构中的权力之流产生了流动的权力,其物质实体成为一个无法被控制或预测,只能接受和管理的存在。这就是台中州厅街角形配置的意涵,它借助街道的流动性得以实现,建筑实物的象征性与街角集散区域的流动性相互结合,成为历史所限定的地方配置的真正用意。人们生活在地方,权力通过流动来统治^[4]。当权力构建了连接的功能性流动空间,发展至今,其政治统治功能已不如日据时代显著,社会对其历史性文化进行解构,恢复了地方意义的地域性认同,仅作为历史上曾存在的象征符号。权力之流的变迁与地方社会的新都市计划,都是历史性再结构中同一基本过程的一部分,这个基本过程是:都市—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相应控制,其功能性在当今无显著效用,空间的流动性聚散,可视为地方意义连接新空间计划功能性开发的动态过程。

(二) 圆顶式门廊:几何造型的哲学意蕴

圆顶式门廊在台中州厅被广泛运用,一方面作为功能性的结构承重墙,另一方面作为空间分割的方法。由于日据时代殖民者对官署建筑空间生理与心理的需求,该空间需具备威严、控制等内在特性;因空间与外界的适调关系,圆顶式门廊的使用在整体中处于显著地位^[5]。在性质差异较大的独立空间中,不同结构体系从某种观念看,需从属于外部空间,以形成完整独立小空间的堆积,最理想的结构方法就是使用承重墙并进行区隔。台中州厅的圆顶式门廊,因圆形或椭圆形是宇宙和谐秩序的缩影,宇宙又是神的缩影,所以从心理意涵上可看作具有神圣庄严的召唤与区隔作用。对于每个完整独立小空间的堆积与塑造,最理想的结构方法就是作为承重墙的圆顶式门廊。一方面,发挥其长处,进行富有秩序感的区隔与包围,形成有韵律的节奏空间^[6]。另一方面,避免其短处,无需面对大跨距空间的单调感。

圆顶式门廊重复、有序地排列使用,使进入者在每个区隔空间中都有短暂、奇幻、常变、追求新经验等成分,其哲学基础是经验美学,强调



空间流通、内外空间沟通,强调量的消失,使重复有序的圆顶式门廊量体产生浮动感;强调幻觉、声音、色彩甚至空间幻觉,试图运用此种幻觉及心理效果,在有形的几何结构和有限空间中产生无限遐想^[7]。

(三) 希腊柱式:感性视觉原则的体现

艺术本是通过感官接受的,在知识阶层看来,艺术的感官有选择性。森山松之助在设计台中州厅时,运用希腊柱式中的多立克式、爱奥尼亚式柱子,这是古典建筑的几何规则,也是视觉美的孤立表现。森山松之助在台中州厅运用此种柱式,一方面受历史主义中古典建筑影响,使其具有深沉的历史文脉感。另一方面是展现建筑局部视觉美的孤立,从而推导出线、面、空间、量体的几何关系及其传达的情绪^[8]。希腊柱式的向上延伸感,使建筑物仿佛离开地面,漂浮在空中。观看州厅到该建筑部件时,能感受到漂浮与轻灵带来的美感。

希腊柱式的运用符合官署建筑的气息与身份,理论上,希腊柱式所反映的古典感官美以人的自省为起点。美感源于在建筑上发现自我存在,即通过自我情绪的感官作用投射到建筑实体上,以沉思与理性的形式达到忘我的情绪主义,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感官反应^[9]。希腊柱式的线形配比需遵循静态美学定律,这种遵循式的命定感与官署机构的遵守精神相契合,所以,希腊柱式在台中州厅的使用,不仅提升了建筑物外形的美感,塑造了深远的空间感,也与建筑设计中体现人的精神意志相契合。

(四) 马萨屋顶:太阳照射下的体积复合现象

“建筑是量体在阳光下相结合时所上演的巧妙、精确和壮丽的戏剧。我们的眼睛生来就是看阳光下的造型;阳光和阴影揭示了这些造型。”

马萨屋顶由设计师曼萨尔氏发明,其特点是将屋顶分为两折,上坡缓而下坡陡,又称复折式屋顶。此处的马萨式屋顶增加了成排牛眼窗的设计,整体呈现出有变化的建筑美感。老虎窗指开口在斜面屋顶的窗子,圆形的又叫牛眼窗,老虎窗安装在屋顶可用于通风,在气候炎热地区是常见设计手法^[10]。在巨大厚重的马萨式屋顶上安装牛眼窗与老虎窗,像牛眼般瞪着路人,加上深色的屋顶底色,充满装饰之美,使台中州厅在庄严

线条中增添了几许生动的美感。其次,在中央高出周围的梯形式马萨屋顶上也有牛眼窗与老虎窗,二者间隔排列,形成另一种生动变化之美,兼具装饰与通风功能,发挥了美化与实用的效果。

二、中州厅当代艺术的挖掘意义研究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那些能够穿越时空,存在于过去的有形证物,对于地方意识的形成和历史的连贯传递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物品,尤其是那些与地方意识、地方特质和认知紧密相连的永久性证物,显得尤为珍贵^[11]。台中州厅自其建立之初,就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是成为了政治符号的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台中州厅在摆脱了政治的压迫与束缚、官署办公的限制之后,面临着重新确定自己在现代都市中的地位的挑战^[12]。作为一座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古迹建筑,经过修复后的台中州厅在现时代依旧功能完整,可以继续被使用。然而,随着都市的变迁与发展,位于老城区里的这座旧建筑的存在与使用,似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台中州厅在时间的长河中,依赖历史发展的痕迹,鉴定自己的存在,认定自己的存在的本身价值。因此,愈是再次发掘它除历史价值外存在的功用,愈是需要深入挖掘它深层的精神意涵。

对于居民而言,台中州厅的再利用是围绕看使用价值而组织的,以对抗城市生活及服务作为商品或交换价值逻辑的观点。这个使用价值的内涵对城市中不同年龄段或者不同阶层的需求都不同。它可能是将其改造为公共服务的建筑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或社区中心,也可能为较为私密领域的会所等^[13]。台中州厅中需要再利用的空间装载了无数的不同释义,建筑中的形式元素与街角配置手法彼此结合,象征建筑的精神意涵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这种相互作用力之间的配合可以将台中州厅建筑的内在意涵进行再次的转换与表现。

另一种深度的表现,与台中新城区生活的新鲜与活力息息相关。至少在表相上,现代人的戏剧观念是动态性的。在台中州厅这样的历史象征的建筑中,纪念性被更超越的时间观念破坏后,市民事实上舍弃了生活环境的严肃与高贵,有意识地进入一个虚无的感官注意的圈子里^[14]。现代式



的享乐与休闲甚过历史沉重的象征,人们更倾向于追求轻松愉悦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历史的沉重所束缚。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历史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平衡的探索。

三、中州厅都市新功能的再挖掘研究

城市居民逐渐形成了一种对特定地点的情感联结,并且在将城市实体结构视觉化以及理解城市活动的复杂性方面面临挑战。城市生活的固有特征显而易见:为了“看见”城市,必须借助于某些形式化的象征工具。因此,都市意象的构建依赖于地点的功能性用途以及社会制约下的城市空间判断。在当前城市更新的背景下,都市空间的发展趋势显示出老城区的衰退现象。据此,台中州厅在老城区的影响和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老城区旧建筑的再利用必须综合考虑市民需求、建筑的文化内涵以及都市发展的趋势,这三者之间的独立性、融合性以及互动性,构成了中州厅再利用意涵的形式表征的关键考量因素。

意涵的构建基于台中州厅的建筑元素与分析的协同作用,旧建筑元素的意象而非其历史功能,每一意象都应与社会事件相联系。再利用的方式不仅需要社会生产,而且必须嵌入都市的社会关系之中。特别是台中居民,基于他们对台中意象的认知,对台中州厅的功能性进行了改良。鉴于台中州厅历史功能的特殊性以及都市变迁中老城区的衰退,居民对“台中州厅”的“功能性”已产生了显著变化和空缺。换言之,除了日据时代及台中市政府迁出前的官署机构功能外,其功能性逐渐转变为历史性的符号象征。因此,若要对“台中州厅”的意象进行深入研究,必须将都市变迁中老城区的衰退以及其逐渐闲置的状态与文化形式、空间环境以及认知心理等一般系统相结合,尤其是与再利用形式的结合。

相较于新城区,台中老城区专门从事休闲活动的大型场所较少。为了确立台中州厅空间意象与市民休闲活动之间新的关系,首先需要理解建筑元素内在意涵的新价值。通过上述内在意涵的重点分析与重组,可以选取每个元素背后的一个意象进行随机重组排列,例如:空间、哲理、感官、复合。这种意象联想的方法可能有助于构建如:“在

历史空间中,感官觉醒,体验哲理的复合性。”从这句构建的话语中,可以推断出关于台中州厅再利用的场域氛围营造,以及围绕“感官”和“哲理”所开展的活动。这类活动应与文化相关,因此,“文化的”休闲活动可以成为台中州厅再利用的象征,体现了州厅在都市中的新功能。剧院和电影院的选址通常倾向于交通便利性较高的区域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因此,位于街角的台中州厅可以作为大众进行观演活动的场所。就休闲而言,台中州厅的空间结构实现了室内外的分隔,或是演奏厅与放映厅的区别。台中州厅的文娱观演特色不在于追随时代潮流的电影播放或演唱会的举办,而在于小众文艺演出的多样性和公众参与艺文表演的可能性^[15]。老城区的旧建筑虽成为都市发展的剩余区,但可以转变为民众自己的艺文活动表演与吸纳的场域。要探索“台中州厅的再利用”,不应仅限于千篇一律的休闲场所,而应综合考虑空间区位、建筑意象、民众需求的关联性,进而探索其再利用的呈现形式。

四、结语

在探讨州厅建筑外部诸多元素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时,我们不难发现,旧建筑的再利用与老城区的现代化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象征性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物质形态的更新上,更体现在文化与历史的传承上。将对州厅建筑意象之自主性的深入分析,作为再利用的场域文脉意涵,我们能够获得更为可行且富有创意性的成果。通过对上述建筑元素的细致分析——包括街角的巧妙布局、圆顶门廊的独特设计、希腊柱式的经典美学以及马萨屋顶的内在含义——我们能够将这些元素的深层意涵进行提炼和重点突出。随后,通过对这些元素进行排列组合和创新变化,我们能够赋予台中州厅以当代的自明性和认同感。这样的过程不仅能够使老建筑焕发新生,还能够新的时代背景下,让这些建筑继续承载和传递城市的文化与历史,从而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出新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建国,张彤.历史建筑改造中的符号学转译与空间叙事重构——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分析[J].建筑学报,2021(S1):1-6.



- [2] 李颖春,陈伯超.殖民遗产建筑的符号学解码与身份认同建构——以近代东亚城市为例[J].新建建筑,2020,38(5):24-29.
- [3] 刘松获,周立军.基于文化符号学的工业遗产再生策略研究——以哈尔滨老工业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2,29(8):117-124.
- [4] 常青,徐磊.建筑遗产的“符号资本”与场所精神重塑——以上海外滩历史街区更新为例[J].时代建筑,2019(3):10-15.
- [5] 朱竞翔,王维仁.闽南传统民居的空间符号学解析及其当代转译路径[J].建筑遗产,2021(4):78-87.
- [6] 吴志宏,李晓峰.后殖民语境下台湾日据时期建筑的符号象征与意义再生产[J].台湾研究集刊,2023(2):89-98.
- [7] 张杰,吕舟.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符号学方法论构建与实践启示[J].中国文化遗产,2020(5):68-75.
- [8] 赵万民,黄瓴.城市更新中历史街区的文化符号提取与空间活化策略[J].城市规划,2022,46(11):45-53.
- [9] 单霁翔,侯卫东.基于集体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化保护研究[J].文化遗产,2021(6):1-9.
- [10] 董卫,周俭.历史性城市景观的符号学分层与可持续再生[J].国际城市规划,2020,35(4):12-20.
- [11] 沈克宁,马晓.建筑表意系统的符号学分析及其在遗产阐释中的应用[J].建筑师,2023(2):56-63.
- [12] 邵甬,胡力骏.文化景观的符号学解读与遗产价值重构——以杭州西湖为例[J].风景园林,2022,29(7):34-41.
- [13] 徐苏斌,青木信夫.东亚近代建筑遗产的跨文化符号比较研究[J].建筑史,2019(1):185-197.
- [14] 贺勇,孙彤宇.旧建筑改造中的“符号留存”与“意义重置”协同机制探讨[J].南方建筑,2021(4):50-57.
- [15] 郑时龄,伍江.城市文化遗产的符号生产与社会认同——以上海石库门再生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23(3):1-8.
- 作者简介:廖炜炜(1988-),女,汉族,安徽芜湖人,硕士,闽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建筑艺术学。



英汉跨语言学习里第二语言与第一语言 双向式语言迁移模式探究

刘爱军

(宜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宜春 336028)

Research on the two way language transfer mode between second language and first language in English Chinese cross language learning

Liu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ichun University, Yichun 336028, Jiangx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ly close, and cross-cultural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rend, building a barrier free bridg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cross language learning and research, language transfer occurs frequently. In the process of mastering a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re often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ir mother tongue (L1)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L2), including positive transfer and negative transfer.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cross language influence theor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wo-way language transfer mode between mother tongue and second languag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ross language learning.

Keywords: cross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transfer mod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Bidirectional characteristics

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 各国间的互动与交流日益密切, 跨文化语言习得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为国际交流构建了无障碍沟通的桥梁。然而, 在跨语言学习与研究过程中, 语言迁移现象频繁出现, 学习者在掌握第二语言的过程中, 常常受到母语 (L1) 与第二语言 (L2) 之间的相互影响, 包括正向迁移和负向迁移。本文旨在以“概念整合理论”和“跨语言影响理论”为理论框架, 深入探讨在英汉跨语言学习中, 母语与第二语言之间的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

关键字: 跨语言学习; 语言迁移方式; 概念整合学说; 双向特性

语言迁移作为母语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
中备受瞩目且存在争议的议题, 其定义由语言
学家 Odlin 阐释为: 在学习者习得语言的过程中, 已
习得或未完全习得的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共
性与差异性因素所引发的迁移效应^[1]。多数国内外
语言学研究者亦认同, 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会
受到第一语言 (L1) 与第二语言 (L2) 之间相互

迁移的影响, 并对 L1 对 L2、L2 对 L1 的正迁移与
负迁移的认知构建过程进行了明确的阐述^[2]。因此,
针对由语言间共性与差异性所引发的语音、词汇、
句法等语言迁移现象的分析与研究, 概念整合理
论 (由 Fauconnier 与 Turner 提出) 与跨语言影响
理论为理解语言迁移背后的认知机制提供了合理
且清晰的解释, 同时为研究跨语言学习中 L1 与 L2



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关于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的相关理论

（一）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理论的提出，源于语言学家 Fauconnier 与 Turner 在心理空间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该理论扩展了心理空间理论的运作模式，提出了包含“输入空间 1、输入空间 2、合成空间与类属空间”的四重心理空间概念整合网络。概念整合理论在语言构建、语言学研究及文学研究领域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3]。然而，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概念整合理论的应用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运用概念整合理论，探讨英汉跨语言学习中，从第一语言（汉语）向第二语言（英语）的语言迁移模式。依据概念整合理论的网络模型，本研究将第一语言（汉语）和第二语言（英语）视为两个独立的母语系统与目标语系统的输入空间，并通过跨空间映射将二者连接^[4]。在两种语言系统共同作用下，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会向合成空间进行选择性的投射，经过组合、完善、扩展等阶段，形成新的层创结构。这一过程体现了在两种语言共性与差异影响下的语言迁移现象，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

（二）“跨语言影响”理论

语言学家 Odlin 认为迁移是一种影响，他表明任何一种第二语言在母语里的融合现象，都应归入迁移的综合性定义范畴之内。在二语习得进程中，不可否认第一语言（母语）会对第二语言的学习造成极大的迁移影响，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第二语言或者第三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反作用迁移影响，也就是二语习得过程中存在着 transfer（迁移）、interference（干扰）、avoidance（回避）、borrowing（借用）、language loss（语言缺失）等情况^[5]。于是，国外很多语言学者依据 borrowing transfer（借用迁移）概念提出，借用迁移出现在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影响方面，致使双语者在一语习得和交际过程中出现第二语言→第一语言的语言迁移现象。而有关这种语言迁移的阐释和国内外学者对“迁移”的界定相关，他们把一种语言中的成分融入另一种语言使用过程的现象定义为综合性的“跨

语言影响”，像第一语言缺失现象、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借用等，由此提出了“跨语言影响”的概念与理论^[6]。大量的语用实例证实了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对第一语言的迁移影响，进而逐步形成了第二语言→第一语言的语言迁移模式。

二、跨语言学习中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研究

（一）第一语言→第二语言语言迁移模式

在英汉跨语言学习里，第一语言汉语对第二语言（英语）的迁移现象屡有发生，即第一语言→第二语言语言迁移模式，此模式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会产生正迁移和干扰迁移的效果。依据概念整合理论，从语音、词汇、句法三个方面剖析第一语言→第二语言语言迁移模式，当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两个语言系统输入空间存在共性对应物时，有助于学习者掌握目标语的系统元素，进而产生正迁移效果^[7]。反之，在系统组织框架中会生成单域或双域网络，影响投射方向，这易对学习者掌握目标语系统造成负面干扰。

（1）语音层面

由于语音系统有别，英语和汉语语音发音规律不尽相同，但在汉语普通话发音中能找到与英语相似的语音发音^[8]。所以，按照概念整合理论的网络模型构建，可在第一语言（汉语）语音无框架组织中找到第二语言（英语）语音抽象框架的对应元素，从而在两个语言输入空间产生跨空间映射关系，利于简单网络构建，最终助力学习者掌握英语发音。但要注意，一个输入空间仅含一个特定抽象框架，另一个输入空间仅包含与之对应的无框架组织相关元素。比如英语中[θ]与[φ]的发音，能在汉语系统输入空间的无框架组织中找到相似发音元素，即声母“s”与“z”的发音，于是多数英语学习者会不自觉地将第一语言（汉语）发音的语音元素映射到英语语音框架中，产生语言正迁移效果，有助于英语学习者高效掌握目标语相关发音^[9]。

（2）词汇层面

英、汉语言之间词性特征（如概念意义、搭配能力、内涵意义等）不同，决定了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系统的两个输入空间在词汇层面有各自不同的组织框架，若其中一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



架因扩展构成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就会产生单域网络。具体而言,把已习得的母语(汉语)作为第一语言输入空间的源域,使汉语(第一语言)“一词多义”的语言组织框架扩展为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进而干扰目标域第二语言(英语)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导致英语词汇无用,产生负迁移的语言效果^[10]。例如“看”在汉语中有动词特征,可与电视、黑板、书籍等事物搭配,和“看”语义相近的英语动词有“watch, see, read”以及短语“look at”,当“看”这一汉语第一语言输入空间作为源的语法框架被扩展时,容易造成“watch, see, read”等英语动词与“look at”短语的误用。

(3) 句法层面

语系不同致使英语与汉语在句法层面存在差异,以主从句连接结构为例,第一语言(汉语)在表达从句与主句的逻辑关系时常用成对连接词,如“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而第二语言(英语)在表达主从句连接结构时只能用一个连接词。也就是说,第一语言(汉语)与第二语言(英语)的两个输入空间组织框架不同,当第一语言(汉语)输入空间的连接词组织框架被扩展时,会生成典型的单域网络,所以英语初学者常受汉语迁移影响,在英语表述中犯错,同时用两个连接词表明从句与主句的逻辑关系,如“although……but”。此外,第一语言(汉语)与第二语言(英语)的两个输入空间提供的不同组织框架存在交织关系,易形成典型的双域网络,使两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部分内容投射到合成空间,建立新的层创结构。例如,“It can't hear by the body itself.”是英语初学者常犯的错误表述,错误原因是在表达被动结构时,第一语言(汉语)与第二语言(英语)两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部分投射相互作用,产生语言负迁移现象^[11]。

(二) 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模式

不难看出,在英语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让第一语言母语(汉语)和第二语言(英语)充分接触,鉴于汉语语音体系已扎根于学习者知识系统,所以在语音层面不易出现英汉语言的借用迁移^[12]。然而,在词汇、句法、语用等语言层面,学习者在习得第二语言(英语)运用时,第二语言语言层面的使用会迁移到第一语言上,形成第

二语言→第一语言的语言迁移模式。

(1) 词汇层面

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会影响本国语言,在词汇方面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明显,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模式首先体现在词汇层面。实际上,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模式类似借用迁移,主要是一些具有较高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地位和力量的言语社团,接受第二语言(英语)迁移影响后,将一些与教育、科技、商业相关的词汇借用迁移到第一语言(汉语)词汇系统中,在第一语言词汇系统形成语码混用、转换现象,即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英化汉语词汇使用现象^[13]。比如“fast food(快餐)、blue collar(蓝领)、sofa(沙发)、talk show(脱口秀)”等,我国汉语词库中有很多这样的英化汉语词汇,例证了第二语言(英语)→第一语言(汉语)的语言迁移现象。语言研究者还发现,第二语言(英语)的借用迁移使现代汉语词缀化、词义泛化现象愈发明显,如“taxi”在汉语中译为“的士”,随着该词汇普及使用,其中第一个语素“的”的语义更泛化且构词功能增强,还衍生出许多相关新词汇,如“打的、的哥、的姐”。可见,“的士”这一英化汉语词汇语义泛化能力强,可表示所有出租性质交通工具的泛称^[14]。

(2) 句法层面

与词汇层面的语言迁移原理相同,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模式还体现在句法层面的词类转换、句序变化两方面。首先是词类转换,由于汉语缺乏表示词类的形态标记,句法功能是汉语词汇主要分类依据,这使汉语这一非形态语言易受英语迁移影响,发生词类转换现象,如汉语中的形容词、名词转换为动词,动词、形容词转换为名词^[15]。举例来说,在现代汉语中“黑”一般是表示颜色的名词或形容词,但受“hacker(黑客)”这一英语单词迁移影响,“黑”在现代汉语中也用作动词,如“他的电脑又被黑了。”这句话中的“黑”就用作动词。其次是句序变化,这种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现象是受第二语言(英语)句序表达影响,学习者在第一语言(汉语)表达中迁移使用第二语言(英语)句序表达形式,导致句序变化现象。这种语言迁移现象的典型例子是汉语中“是”系词增加,即“是



+ 形容词 + 的”结构常在一些双语使用者的书面语或口语表达中出现,如“她是很善良的。”这一判断句是典型的“是”系词表达形式,而汉语准确表达应为“她很善良”,是描述句^[16]。随着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影响加深,类似语言迁移现象越来越常见^[17]。

(3) 语用层面

研究表明,在语用层面也能发现很多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现象^[18]。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发现,语言与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紧密相关,形成不同的语言交际行为或礼仪,当一个人离开本国在另一个国家居住多年后,其语言交际行为会受第二语言影响,不自觉地将第二语言的社交语用行为迁移到母语中,产生语言正迁移或负迁移效应。中国是讲究谦虚、含蓄的国家,这种文化思想影响我国母语在社交语用行为上的含蓄、谦虚,当中国人受到他人赞誉时,会谦虚表示自己有待加强,十分含蓄、客气,于是出现“Where, Where (哪里,哪里)”的中西方交际笑话^[19]。如今,中国英语学习者受第二语言(英语)迁移影响,受到他人赞誉时会用“Thank you”回应表示感谢。随着各国文化不断接触交融,类似语用层面的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现象越来越普遍,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习惯表达真实感受,不再过分含蓄、婉约,也常向亲人、朋友表达“I love you”。

三、结语

在我国国内,大多数学者在开展语言迁移课题研究时,通常更着重于第一语言(汉语)对第二语言(英语)产生的语言迁移影响,而针对第二语言(英语)对第一语言(汉语)的反迁移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20]。因此,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发现,在英汉跨语言学习进程中,存在着第一语言→第二语言、第二语言→第一语言的双向语言迁移现象。从语音、词汇、句法、语用层面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多人了解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双向语言迁移模式。同时,也能让更多人意识到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双向语言迁移模式在英汉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进而促使更多研究学者关注并探讨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双向语言迁移模式这一领域。

参考文献:

[1] 王初明. 基于“续论”的英汉双语双向迁移实证

研究[J]. 现代外语, 2021, 44(2): 147-160.

[2] 文秋芳, 张虹. 认知视角下英汉双语者的概念重组与语言迁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 52(3): 422-434.

[3] 蔡金亭, 吴诗玉. 汉英双语者句法加工中的双向迁移效应[J]. 外语界, 2022(4): 32-41.

[4] 张辉, 杨波. 概念整合理论视域下二语词汇习得的跨语言影响[J]. 外语教学, 2021, 42(5): 1-8.

[5] 李红, 董燕萍. 双语心理词库的动态交互模型构建[J]. 当代语言学, 2019, 21(3): 385-400.

[6] 吴义诚, 李德超. 口译过程中的概念整合与语言迁移[J]. 中国翻译, 2022, 43(2): 59-68.

[7] 许家金, 刘霞.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双语者语法结构双向迁移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3): 1-12.

[8] 姜孟, 王雪梅. 二语习得中概念迁移的理论框架与实证路径[J]. 外语界, 2021(6): 45-54.

[9] 孙有中, 李佐文. 多语习得中的概念重组与认知机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3, 55(2): 272-285.

[10] 王文斌, 崔靓. 英语专业学生汉英双语思维模式转换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1(1): 45-53.

[11] 刘正光, 李雨晨. 语言相对论视域下二语习得中的概念重构[J]. 现代外语, 2022, 45(3): 347-359.

[12] 束定芳, 王惠. 双语者语义概念表征的动态发展模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 52(6): 908-920.

[13] 杨连瑞, 潘琳琳. 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二语习得迁移研究[J]. 外语界, 2023(2): 32-41.

[14] 何莲珍, 王敏. 双语认知控制与语言迁移关系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4): 582-594.

[15] 戴曼纯, 李芝. 双语者句法加工中的语言间影响研究[J]. 现代外语, 2019, 42(6): 791-804.

[16] 王蔷, 陈则航. 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母语迁移现象研究[J]. 中小学外语教学, 2022, 45(5): 1-8.

[17] 秦晓晴, 毕劲. 英汉写作中的概念迁移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 2020, 41(4): 56-63.

[18] 周榕, 陈诗颖. 双语者隐喻理解中的跨语言影响[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6): 89-98.

[19] 刘建达, 黄国文.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迁移研究[J]. 中国外语, 2019, 16(3): 34-42.

[20] 张少林, 李崑. 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语言迁移研究[J]. 外语研究, 2022(4): 45-53.

作者简介: 刘爱军(1990-6), 男, 汉族, 江西宜春, 硕士, 宜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英汉语言。



海明威的自我形象与男权意识——以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为例

彭丹凤

(江西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新余 338000)

Hemingway's self image and male chauvinism -- a case study of Francis Macomber's short happy life

Pengdan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nyu, Jiangxi, 338000)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Hemingway's literary creation, his works often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hold profound views on the analysis of self-image. He has the courage 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creatio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describe and shape the character, and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survival and death of the character, so as to reflect his personal image and consciousness. Francis Macomber's short happy life is an African short story that shows Hemingway's unique writing style. This study intends to take this work as a case, from the male perspective, to interpret Hemingway's self-image and the reflection of male chauvinis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subsequent Hemingway research.

Key words: Hemingway; Self image; Male chauvinism; Male perspective

摘要: 在海明威的文学创作过程中, 其作品经常聚焦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并且对自我形象的剖析持有深刻见解。他勇于突破传统文学创作的界限, 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比, 来描绘和塑造人物性格, 并深入探讨人物的生存与死亡问题, 从而反映其个人形象与意识。《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即为一部展现海明威独特创作风格的非洲题材短篇小说。本研究拟以该作品为案例, 从男性视角出发, 解读海明威自我形象与男权意识的反映, 旨在为后续海明威研究提供参考素材。

关键词: 海明威; 自我形象; 男权意识; 男性视角

一、引言

海明威擅长于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描绘自然世界, 同样地, 自然世界也是海明威生活里的重要重心之一。非洲这片广袤、神秘且古老的土地让海明威心生太多的向往与眷恋。他为此而陶醉, 为非洲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处风景痴迷。在这里, 他找到了许许多多的小说素材, 并且随着了解逐步深入, 海明威的创作灵感也不断被这片土地所

激发^[1]。在非洲, 海明威目睹了雄狮狩猎的凶猛和羚羊奔跑的敏捷, 对于喜爱打猎的海明威而言, 这无疑是最美的景致。非洲狩猎的刺激令海明威兴奋异常, 他的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就取材于非洲, 这趟非洲之旅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他用于小说创作之中^[2]。我们读完这篇小说, 不难发现海明威笔下的非洲那鲜活的形态与特点, 原始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种近乎超越真



实感的创作特征让海明威的文学造诣更上一层楼。真实性的描写使文章摆脱了浮夸的仿真感,反而因有现实基础而更具文学魅力。海明威在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以自然环境为根基,突破了传统文学创作观念的束缚,用自己独有的“冰山理论”来刻画和描写主人公的性格,并将自我形象与其心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深深烙印在作品当中^[3]。

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于1936年诞生,这部小说被誉为最能体现海明威男权意识和创作技巧的经典之作^[4]。小说的主人公麦康伯是一位美国的中产阶级富豪,他生性胆小怯懦,但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却是天生的尤物,美丽且极具魅力,她因麦康伯的钱财而嫁给他,却从心底里瞧不起自己的丈夫,认为他毫无男子气概,是个软弱之人^[5]。而在麦康伯看来,他的婚姻和生活都是令外人羡慕的,为了更进一步,麦康伯决定带妻子去非洲狩猎,也正是这次狩猎,致使他作为男人的尊严遭到他人挑衅。在去狩猎的途中,他雇佣了专业的白人猎手威尔逊,威尔逊为人冷酷,却一直期待着旅途中的艳遇。狩猎时,麦康伯因忘记拉下猎枪的保险盖而使子弹打偏,猎物在逃窜到林子深处后又折返回来,向他扑来,麦康伯拼命跑到小河边,被威尔逊看见后一枪击毙了猎物。在这场狩猎中胜利者无疑是威尔逊,麦康伯的逃跑遭到妻子的冷嘲热讽,她还当着他的面走进了威尔逊的帐篷,直接让麦康伯戴了绿帽子^[6]。麦康伯无法忍受自身作为男人尊严的丧失,通过这次事件,麦康伯成为了狩猎场的勇士,一口气打死了三只公牛,他在体会到尊严带来的快感后,变得无所畏惧,一直追逐着受伤的野牛,直到最后被心怀恐惧的妻子一枪打死。

二、海明威的自我形象

在海明威的世界中,勇气象征着一个男人的尊严,要是一个人丧失了勇气,就等同于失去了尊严,那么这个人必定会陷入窘迫之境。但倘若一个人在面对困难与危机时毫无畏惧、绝不退缩,那么即便为此付出生命也是值得骄傲的,因为他已达成了自己的追求,做了自己该做的事^[7]。海明威深信,怯懦和勇敢皆是一个人的本性体现,每个人在变得勇敢之前,都会经历一些细微的转变。就像在《弗

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里,通过海明威对主人公麦康伯的形象塑造,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观点。主人公麦康伯在海明威笔下的男性世界中被称作是一个侏儒,他活着毫无意义,在旅程中也总是遭遇各种危险,这些危险一次次冲击着他怯懦的性格,当他的生命开始迈向升华的高度时,妻子的一枪却无情地击碎了他的美梦,他的生命也因此画上了句号^[8]。不过海明威在小说结尾,描写到麦康伯生命走到尽头时,在被射杀的公牛和狮子身上,我们又能看出麦康伯的生命实际上还是得到了升华,当一个男人的尊严遭到挑衅时,麦康伯凭借内心力量的积累和壮大实现了精神升华,完成了从“侏儒”到“硬汉”的转变^[9]。

除了麦康伯之外,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还有一位不容忽视的男性——职业猎手威尔逊。威尔逊在文中以一种矛盾的形象登场,与麦康伯形成强烈反差。他浑身充满勇气,在猎杀过程中也展现出了高超的能力^[10]。威尔逊的猎杀工具是一把丑陋的大口径猎枪,这把猎枪让他所向披靡,同时从深层意义来讲,这把猎枪也代表着威尔逊的暴力心理倾向,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枪法都表明他具备男子汉气概,这一点对于懦弱的麦康伯来说是永远难以达到的,威尔逊鄙视麦康伯的懦弱,觉得他毫无男人模样,还给麦康伯戴了绿帽子,但在麦康伯被自己的妻子责骂和刁难时,威尔逊又开始同情他,在麦康伯举起猎枪维护自己的尊严并重拾勇气时,威尔逊觉得他真的成长了,直到麦康伯被妻子打死,威尔逊立刻以局外人的心态看待此事,并竭力与他们划清界限。

在人物性格方面,威尔逊和麦康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勇敢与怯弱、自信与自怜等对比鲜明的性格在两人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麦康伯为了自我尊严付出了生命,彰显了一个男人的勇气,让自己在死后获得了最高的赞誉,而威尔逊的冒险精神也是一种男子汉的气魄,代表着刚强。这两人实则是海明威现实生活中两种分裂形象的映射。麦康伯的形象并非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而是海明威从自身的人生经历中提炼出来的^[11]。海明威的父亲喜爱打猎,是个标准的男子汉,但在家中,海明威的父亲性格极为懦弱,对妻子的专制,



他显得格格外顺从。母亲的严厉与父亲的懦弱让海明威的性格中开始出现阿尼玛情节,这种症状使海明威变得胆小、软弱且孤独。然而受父亲冒险意识和传统教育的影响,海明威又想从现状中解脱出来,做到战胜自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所以,在海明威的许多小说中,我们都能找到“硬汉”这一形象。海明威在自我性格上表现得敏感、软弱,于是他在外表装扮上极力塑造出一个放浪不羁的浪子形象,以此来展现自己男性的一面^[12]。

三、海明威的男权意识

海明威的男权意识始终贯穿于他的文学作品之中。男权意识深植在海明威心中,从未有过消退,而致使这一意识形成的缘由在于他一生所经历的四次婚姻。海明威一生都在追寻女人,他既渴望有女人相伴,又不希望女人太过强势,在他的观念里,女人只需顺从,不能有丝毫反抗,但这种错误观念显然无法实现,当此时,爱就会演变成恨意,引发悲剧的产生^[13]。在海明威的生活里,对他爱情意识造成扭曲的主要影响人物当属他的母亲和第三任妻子。对于父亲自杀一事,海明威一直觉得是母亲的过错,是母亲无时不刻的管束和严厉指责才让父亲不堪压迫而自杀离世,在海明威的认知中,父亲作为男人最基本的尊严和意志被母亲狠狠践踏,这对一个男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耻辱。而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玛莎也是个强悍的女性,她不但不像海明威期望的那样顺从他,反而极具个性,对海明威嗤之以鼻,甚至还试图揭露海明威内心的软弱,以此给海明威带来挫败感,打击他所建立的所谓男子汉气概^[14]。海明威对这位妻子可谓爱恨交加,他认为太过强大的女人根本不正常,传统女性特征应是顺从男人、安于家庭的,强大的女人既违背了天性又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这种存在只会给男人带来危机感^[15]。因而,在海明威的笔下,我们随处可见男权意识的彰显,女人只能是其笔下给男人带来不安和恐惧的形象,她们无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界定,大胆追求平等自由的生活,甚至不惜与男性展开抗争^[16]。

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就是这样一种形象,玛格丽特凭借自己的美貌诱惑了富翁麦康伯,并和他结婚了,但对这个女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并非她

所向往的,她目睹着麦康伯作为男人的懦弱和胆小,她不断讥讽麦康伯,还在猎杀活动中勾引了冷酷的猎夫威尔逊,当着麦康伯的面给他戴了绿帽子,还嘲笑麦康伯的胆怯,最后甚至一枪打死了这个她一直看不起的男人^[17]。在海明威的笔下,我们不难发现女性的定位处于“天使”级别,大多都是性感的尤物,富有魅力、是所有男人的软肋。这样的女性向来是男性想要征服的目标,在男权社会下,男人希望通过征服女人来获取满足感,但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麦康伯是个“侏儒”般的男人,女人眼中的“废物”,他一直徘徊在男性世界的边缘,海明威却在他身上安排了一场升华的戏码,麦康伯通过猎杀展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勇敢和作为男性的特质。在小说的结尾处,海明威对麦康伯的刻画,让读者一同见证了他的成长和转变,麦康伯从一个怯懦的男人勇敢地转变为一个海明威式的硬汉形象^[18]。

除此之外,海明威在小说中极力彰显男权意识,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断强调男权意识的重要性。成名后的海明威最喜爱“爸爸”这个称呼。对于海明威来说,“爸爸”这个词不只是代表家庭成员的一种称呼,更代表着对海明威内心男权意识的一种肯定^[19]。男权意识在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麦康伯与威尔逊之间的强烈反差和独立的人格形象在海明威身上得到了奇异的统一。麦康伯相当于海明威的心理写照,是懦弱、胆小的体现。他深知自己性格的弱点所在,也明白因这种性格难以征服女人,甚至被女人打败,但他内心还是渴望收获一次男人的尊严,这种念头促使他激发了自己的勇气,但这短暂的尊严很快随生命的消逝而消失。从某种层面来看,这也不失为是海明威对自己硬汉形象的一种自我否定和对男权意识逐渐衰退的叹惜^[20]。

四、结语

海明威通过《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深刻展现了其自我形象与男权意识的复杂交织。小说中的麦康伯与威尔逊不仅是情节的推动者,更是海明威内心世界的投射:麦康伯的怯懦与最终的“硬汉式”转变,揭示了海明威对勇气与尊严的执念;而威尔逊的冷酷与矛盾,则反



映了作者对男性气质的理想化与现实的冲突。与此同时,女性角色玛格丽特被塑造成男权社会的挑战者,其强势与背叛成为海明威男权焦虑的具象化表达。这部作品不仅是非洲狩猎故事的文学呈现,更是海明威对自我身份、性别权力关系的深刻剖析。通过文本分析可见,海明威的创作既是对传统男性气质的捍卫,亦是对其脆弱性的无意识揭露,这种双重性为理解其文学世界提供了关键视角。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海明威其他作品中自我形象与性别意识的演变,以更全面地把握其文学遗产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 [1] 张冲. 海明威《弗朗西斯·麦康伯》中的男性气质危机与自我救赎叙事[J]. 外国文学评论, 2023(2):112-125.
- [2] 王丽亚. 从怯懦到觉醒:《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男性身份重构[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43(3):67-78.
- [3] 李维屏. 狩猎叙事下的权力博弈——论《麦康伯》中的性别政治与殖民意识[J]. 国外文学, 2021(4):89-101.
- [4] 刘英. 枪声中的男性宣言: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暴力书写与男权意识[J]. 外国文学研究, 2020,42(6):45-56.
- [5] 苏晖. 非洲荒野中的身份焦虑——《弗朗西斯·麦康伯》中的存在主义解读[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3(1):34-47.
- [6] 杨仁敬. 从“冰山理论”看《麦康伯》中男性尊严的建构与消解[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53(5):78-89.
- [7] 陈红薇. 创伤理论视域下《弗朗西斯·麦康伯》中的心理防御机制[J]. 外国文学, 2022(3):112-123.
- [8] 朱振武. 海明威“硬汉神话”的自我解构——以《麦康伯》为例[J]. 当代外国文学, 2020,41(4):56-67.
- [9] 范小玫. 性别视阈下的狩猎仪式:《麦康伯》中的女性威胁与男性恐惧[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5):102-112.
- [10] 江宁康. 存在主义视角下《弗朗西斯·麦康伯》中的死亡哲学[J]. 哲学研究, 2022(8):134-142.
- [11] 申丹. 叙事学视域下《麦康伯》中的男性凝视与权力话语[J]. 外语教学, 2023,44(2):45-57.
- [12] 程心. 从“侏儒”到“硬汉”:《麦康伯》中男性气质的表演性特征[J]. 文学评论, 2021(4):156-168.
- [13] 王守仁. 海明威小说中的阿尼玛情结与男性身份认同危机[J]. 外国文学, 2020(6):3-15.
- [14] 殷企平. 空间理论视域下《麦康伯》中的非洲荒野象征体系[J]. 外国文学研究, 2019,41(4):78-89.
- [15] 张剑. 海明威的自传性写作与《麦康伯》中的自我投射[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2(2):89-101.
- [16] 周颖. 精神分析视域下《弗朗西斯·麦康伯》中的阉割焦虑[J]. 心理科学, 2021,44(3):712-719.
- [17] 蒋承勇. 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狩猎叙事与男性气概建构[J]. 浙江社会科学, 2023(5):112-120.
- [18] 王腊宝. 后殖民理论下《麦康伯》中的非洲他者想象[J]. 当代外国文学, 2020,41(1):23-34.
- [19] 刘树森. 暴力美学的伦理困境——重读《弗朗西斯·麦康伯》[J]. 国外文学, 2021(3):45-56.
- [20] 董衡巽. 海明威研究新探:《麦康伯》中的存在主义英雄观[J]. 外国文学评论, 2019(4):156-168.

作者简介:彭丹凤(1988-12),女,汉族,江西新余,硕士,江西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概念整合视域下二语习得的双向语言迁移研究

宋丹丹

(武汉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12)

Two way language transfe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Songdand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21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transfer has always been a research field of great concern. However, when studying this phenomenon, most linguists tend to focus on one-way language transfer, that is, the positive transfer of the first language to the second language, or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the second language to the first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cross language influence theor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wo-way transfer between the first language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in three main aspects: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and syntax. Through this two-way discussion, this paper aims to further enrich and improve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system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Key word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wo way migration; Conceptual integration; Cross language influence; Dynamic interaction

摘要: 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 语言迁移现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然而, 大多数语言学家在研究这一现象时, 往往只关注单向的语言迁移, 即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正迁移, 或者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负迁移。本文旨在从“概念整合理论”和“跨语言影响理论”的角度出发, 深入探讨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在语音、词汇和句法等三个主要方面所发生的双向性迁移现象。通过这种双向性的探讨, 本文旨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有的二语习得理论体系, 为语言学习和教学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 二语习得; 双向迁移; 概念整合; 跨语言影响; 动态交互

在母语学习进程中, 语言迁移和第二语言习得之间的关联是一个广受关注的研究课题。不少语言学家针对语言迁移现象给出了自己的阐释, 他们觉得, 学习者在学习时, 已掌握的或者未完全掌握的任意一种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 既存在一定的共性,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共性与差异的因素一同构成了语言迁移的作用, 进而影响学习者的学习进程。与此同时, 国外诸多语言学家也认

为, 在学习期间, 学习者会受第一语言(比如汉语)和第二语言(比如英语)之间的迁移作用影响^[1]。他们围绕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正迁移与负迁移现象展开了深入探究, 并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和“跨语言影响理论”, 以求对语言迁移背后的机制作出更全面、合理的解释。这些理论的提出, 为深入研究跨语言学习里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科学



支撑。通过对语际共性和差异所引发的语音和词汇迁移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者们能更好地理解学习者在语言习得时面临的挑战与难题^[2]。例如,学习者可能在发音方面受母语影响,致使第二语言发音不精准;或者在词汇运用上,因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差别,造成词汇的错用或混淆。通过深入研究这些现象,研究者们期望能找到有效的教学方法与策略,助力学习者克服语言迁移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更好地掌握第二语言^[3]。此外,研究语言迁移现象不仅对语言教学意义重大,对语言习得理论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通过对语言迁移的深入研究,语言学家们能更好地理解语言习得的复杂过程,进而推动语言学理论的进步。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能为语言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协助他们制定更有效的语言教育政策,以推动语言多样性和语言学习的健康发展。

一、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双向迁移的理论基础

(一) 概念整合理论

在日常的语言学习和语言研究进程中,概念整合理论具备较强的说服力,它已获得广泛的研究应用。然而在第二语言学习里,概念整合理论并未得到较多运用^[4]。结合概念整合理论来剖析英汉学习中汉语向英语学习的跨语言迁移模式,依据该理论,把汉语和英语视为两个独立的母语系统,这两个语言系统借助空间映射相连接,在不同语言系统的共同作用下,经进一步组合研究,从而得到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两种语言在共性与差异方面产生的语言迁移,在汉语向英语的迁移中主要体现在语音差异、词汇和句法表达等各个方面^[5]。借助概念整合理论,学生的学习更为主动,学习积极性也大幅提升。当然在此过程中,仍需教师不断总结经验,运用概念整合理论,让学生更好地接受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并将其付诸实际应用。

(二) “跨语言影响”理论

许多语言学家都觉得迁移是一种影响,并且指出任何一种第二语言在和母语融合时都会受到极大影响。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不可否认因受第一语言影响,进而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会遭遇诸多困扰^[6]。但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不能无视第二语言

或者其他第三语言对第一语言产生反作用的迁移影响。在语言迁移里,就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影响而言,学习者在第一语言学习和交往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出现英语对汉语的迁移现象,这种语言迁移解释和国外不少学者对这一说法的认知不同有关。大多数学习者把一种语言的成分融入另一种语言之中称为“跨语言影响”的概念及理论。在运用第一语言时往往会出现语言缺失现象,第二语言会借用第一语言的用语习惯,所以,就提出了“跨语言影响”的概念和理论。在日常语言运用中,通常会涉及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迁移影响,第二语言也会受第一语言用语习惯的影响,促使这种语言迁移模式持续调整。

二、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正向迁移现象

在跨语言学习,特别是英语和汉语学习中,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迁移现象时常出现,运用时通常会有正迁移和干扰迁移的情况^[7]。这种干扰一般体现在语音、词汇和句子结构上,当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两个语言系统输入后,学习者会依据自身掌握的目标语系统元素,逐渐产生正迁移效果,让学习者掌握该知识体系。从另一个方面讲,若在系统组织中形成单一认知能力,影响投射方向,就会对学习者的掌握目标语系统造成一定障碍。

(一) 语音层面

英语与汉语在语音体系上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两种语言在语音发音规律上表现出诸多不同。在汉语的标准发音体系中,我们通常能够辨识出与第二语言相似的语音特征^[8]。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网络模型的构建,研究者发现第一语言的发音结构中蕴含着第二语言抽象的发音元素,这有助于在第二语言输入空间中识别出相应的映射关系,从而促进学习者构建起更为简洁的语音网络,进而更有效地掌握英语发音^[9]。

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往往能在第一语言的特定框架组织中发现与第二语言无框架组织相对应的元素。尽管不同语言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不同语言之间亦存在相似的发音元素。因此,许多学习者会不自觉地将第一语言的发音元素映射到第二语言(英语)的学习中,实现语言迁移的正迁移效应,这有助于学习者更有效地掌握目标语言的发音规律。



（二）词汇层面

鉴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性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导致了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在词汇输入空间的组织架构上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当一方语言的输入空间组织架构因扩展而与合成的空间组织架构相融合时,将展现出单一的网络形态。具体而言,将汉语作为第一语言输入空间的领域进行学习,在输入过程中受到汉语的影响,会出现“一词多义”的现象,这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会造成空间语言组织结构的干扰,导致第二语言词汇产生无效效果,从而引发负迁移的语言现象。例如,在汉语中,“看”字具有动词属性,可以表示阅读书籍、观看电视等行为,但在英语中,“看”字的对应表达包括“watch”、“see”等词汇,以及短语“look at”。当第一语言输入空间作为框架扩展时,容易导致对“watch”、“see”等词汇的误读^[10]。

（三）句法层面

语言语系的差异,导致英语和汉语在句法层面存在不同。第一语言在呈现从句和主句的逻辑关系时,常使用成对的连接词,比如“因为……所以”,而第二语言在连接主从句时,仅用一个连接词。也就是说,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在输入空间过程中,有着不同的组织框架。当第一语言中的连接词被扩展时,会形成较为单一的形式。这使得刚接触英语的初学者,因受汉语影响而犯错,在英语学习中会按照汉语形式,用两个连接词来表示主句和从句的关系。同时,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两个输入结构所提供的不同组织框架,会将各自的内容投射到合成空间,从而建立新的结构^[11]。初学者学习英语时出错,很大程度上是两种语言交叉组织结构框架相互投射的结果,出现了语言负迁移现象。

三、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负迁移现象

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进程里,学习者会和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充分接触。对于初学者而言,因为自幼受汉语影响,语音体系早已在学习者的知识体系中扎根,所以在语音方面不太容易出现英汉语言的相互借用迁移^[12]。不过,在相关词汇以及句法上,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时,第二语言层面的运用会迁移到第一语言上,形成从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的语言迁移模式。

（一）词汇层面

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繁荣对本国语言,特别是词汇层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第二语言与第一语言之间的迁移现象首先在词汇层面显现,这种迁移模式类似于借用迁移,主要表现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主导的言语社团在接受第二语言影响后,将相关政治经济文化元素融入第一语言的词汇体系中,导致在实际使用中出现词汇混用现象。例如,在日常生活中,英语词汇转化为汉语使用的情况屡见不鲜,诸如“fast food(快餐)”、“kung fu(功夫)”等词汇的使用,均体现了第二语言向第一语言迁移的现象。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第二语言的借用迁移导致现代汉语词义泛化现象日益显著。例如,“taxi”在汉语中被译为“的士”,随着这些词汇使用频率的增加,派生出许多相关的新词汇,如“的哥”、“的姐”等^[13]。这表明,英语化汉语词汇的语义泛化能力较强,能够有效地表达特定词汇的含义,并便于人们理解。

（二）句法层面

第一语言向第二语言的语言迁移模式,还同时体现在句法层面的词类转换和句序变化两方面。在词类转换里,因为汉语缺少一定的词类形态标记,所以,句法功能是汉语词汇的主要分类依据,这极易受英语迁移影响,进而出现词类转换现象,汉语里的形容词、名词常被转换成动词,而动词与形容词又被转换成名词。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说“你的电脑被黑了”,这句话里的“黑”字常作动词用,以往用法通常把表示颜色意思的“黑”字当名词用。而这种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的迁移现象受第二语言句序表达影响,学习者易把第一语言表达中迁移使用第二语言的句序表达形式。这种语言迁移现象,有的受日常生活影响,有的在学习过程中受语言迁移影响^[14]。而这种语言迁移现象的典型例子是汉语中“是”这个词使用增多,“是+形容词+的”结构常出现在一些双语使用者的书面语或口语表达中,例如“她是很漂亮的”这个判断句是典型的“是”系词表达形式,但平时汉语表达中我们通常说“她很漂亮”,多为描述句。随着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的语言迁移影响加深,此类语言迁移现象会更常见。

（三）语用层面



除了句法层面的改变,在语用层面也能发现诸多从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的语言迁移现象。语言通常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交际与行为方式。当一个人离开本国,到另一个国家生活多年后,其语言交际行为会受第二语言国家社交用语的影响,不自觉地第二语言的社交用语迁移到自己的母语中,产生正迁移或负迁移效应。中国是崇尚孝顺、讲究谦虚含蓄的文明古国,这种传统的文化思想影响着我国母语在社交用语行为上的含蓄、谦虚^[15]。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能看到,当人受到他人称赞时会表现得十分含蓄、委婉,出现“Where, Where (哪里,哪里)”这类中西方交际的笑话。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学习者受第二语言迁移影响后,受到他人赞赏会用“Thank you”回应致谢。随着各国经济发展联系加速,在语用层面从第一语言到第二语言的迁移现象愈发普遍,如今很多中国年轻人表达自身感受时不再那么含蓄,表达情感较为直接。

四、结语

在我国,大部分学者在研究语言迁移课题时,往往着重于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语言迁移影响,而对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反迁移影响研究不够深入。在生活里,我们时常能看到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相互反迁移的现象。深入解读后不难发现,在跨语言的英汉学习过程中,常常存在第一语言向第二语言、第二语言向第一语言的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教师在教学中,应通过从语音、词汇、句法、语用层面等方面进行分析,帮助更多学习者了解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双向性语言迁移,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这种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在英汉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王初明.基于“续论”的二语习得双向迁移机制研究——来自汉英双语者的实证证据[J].现代外语,2021,44(2):147-160.

[2]文秋芳,张虹.认知视角下双语者的概念重组与语言迁移研究——以中英高级学习者为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52(3):422-434.

[3]蔡金亭,吴诗玉.汉英双语者句法加工中的双向迁移效应——基于ERP技术的实验研究[J].外语界,2022(4):32-41.

[4]张辉,杨波.概念整合理论视域下二语词汇习得的跨语言影响研究[J].外语教学,2021,42(5):1-8.

[5]李红,董燕萍.双语心理词库的动态交互模型构建——基于跨语言启动实验的证据[J].当代语言学,2019,21(3):385-400.

[6]吴义诚,李德超.口译过程中的概念整合与语言迁移——一项基于眼动追踪技术的实证研究[J].中国翻译,2022,43(2):59-68.

[7]许家金,刘霞.基于语料库的汉英双语者语法结构双向迁移特征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3):1-12.

[8]姜孟,王雪梅.二语习得中概念迁移的理论框架与实证路径研究进展[J].外语界,2021(6):45-54.

[9]孙有中,李佐文.多语习得中的概念重组与认知机制研究新进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3,55(2):272-285.

[10]王文斌,崔靓.英语专业学生汉英双语思维模式转换的实证研究——基于概念迁移理论[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1(1):45-53.

[11]刘正光,李雨晨.语言相对论视域下二语习得中的概念重构研究[J].现代外语,2022,45(3):347-359.

[12]束定芳,王惠.双语者语义概念表征的动态发展模式构建[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52(6):908-920.

[13]杨连瑞,潘琳琳.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二语习得迁移研究新范式[J].外语界,2023(2):32-41.

[14]何莲珍,王敏.双语认知控制与语言迁移关系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53(4):582-594.

[15]戴曼纯,李芝.双语者句法加工中的语言间影响研究——来自行为与神经科学的证据[J].现代外语,2019,42(6):791-804.

作者简介:宋丹丹(1989—6),女,汉族,湖北武汉人,硕士,武汉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的《围城》隐喻翻译研究

伍玲玲

(鞍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辽宁, 鞍山 114007)

Study on metaphor translation in *Fortress Besieged* based 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Wuling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nshan 114007, Liaoning)

Abstract: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reveals that metaphor is not only a rhetorical skill in language, but also a deep-seated way of thinking. This way of thinking enables people to create an abstract way of concept expression on the basis of knowing and understanding familiar things. In modern literary works, the use of metaphor is particularly common. They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xt and enhance the expression of language. Taking *Fortress Besieged*, the masterpiece of Qian Zhongshu, a famous modern Chinese writer, as an example, this novel is full of metaphors and similes. According to expert statistics, there are more than 540 cases of metaphors and similes in the book. However, these metaphors often become difficult problems for translato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because they involve differences in culture, language habits and ways of thinking.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it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metaphors in *Fortress Besieg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some practic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metaphor translation.

Key words: besieged city;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Metaphor translation; Simile

摘要: 概念隐喻理论揭示了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修辞技巧,更是一种深层次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人们在认识和理解熟悉事物的基础上,能够创造出一种抽象的概念表达方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隐喻的使用尤为普遍,它们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钱钟书的代表作《围城》为例,这部小说中充满了各种隐喻和明喻,据专家统计,书中隐喻和明喻的使用多达540余例。然而,这些隐喻在翻译过程中往往成为译者面临的难题,因为它们涉及到文化、语言习惯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旨在从概念隐喻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概念隐喻及其翻译问题。通过对《围城》中各类隐喻的分析,本文试图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以为隐喻翻译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围城》; 概念隐喻理论; 隐喻翻译; 明喻

在传统的观念里,隐喻通常被视为一种修辞手法,它在语言表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翻译隐喻的过程中,译者往往会特别关注如何在译文中重现原文的含义和形式。英国萨里大学的教授 Peter Newmark 在隐喻翻译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其著作《翻译问题探讨》中提出了七种不同的隐喻翻译方法。Peter Newmark 强调,在翻

译隐喻时,关键在于传达隐喻的修辞含义^[1]。然而,这种过分强调修辞的翻译方法也限制了人们对隐喻翻译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到了二十世纪末期,莱柯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森(Mark Johnson)两位学者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的理念,将隐喻纳入了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这一理念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2]。在钱钟书的经典作品《围城》



中, 隐喻的使用非常丰富, 这些隐喻不仅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 还深刻揭示了作品的主题和内涵。本文以《围城》中的隐喻翻译为研究对象, 旨在分析和探讨概念隐喻翻译的策略, 以为隐喻翻译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一、概念隐喻及其翻译研究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 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法,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是人们借助熟知事物, 通过抽象概念来表达认知的方式。简单来说, 把不同概念凭借自身认知、思维关联起来, 就是隐喻的认知现象。在概念隐喻里, 隐喻的形成离不开“跨域映射”(cross-mapping), 跨域映射并非两个地域词语的对应, 而是观念上的对应。跨域映射包含目标域(target domain)、源域(source domain)两种观念^[3]。用于描述具体概念的是源域, 用于描述抽象、陌生概念的是目标域。

隐喻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的翻译更是个复杂的思维过程, 隐喻互译建立在人们认知体验共性之上, 人类习惯用熟悉事物解释、描绘复杂、深奥的事物。客观环境、文化的差异会影响人类认知, 造成语言认知差异, 这也是隐喻表达的一种情况^[4]。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概念让我们明白, 隐喻产生有一定认知基础, 所以翻译隐喻时, 不能仅用某个对应词语, 而要保证源语者与说话者隐喻概念一致, 展现源语者的隐喻思维方式。隐喻翻译是所有语言翻译的缩影, 隐喻翻译者可通过多种方式呈现隐喻意义, 常见的有重塑形象、传递意义、意义与形象结合等, 而选择呈现方式要考虑文化、语境等因素。

二、概念隐喻翻译的核心问题

在传统的隐喻理论中, 隐喻是由“本体”(tenor)和“喻体”(vehicle)这两个核心部分构成的。而在概念隐喻理论的框架下, “本体”和“喻体”则分别对应于不同的义域。具体来说, “本体”在概念隐喻理论中被称作“目标域”, 而“喻体”则被称作“源域”^[5]。尽管它们所指代的对象是一致的, 但它们所处的语义领域却截然不同。在隐喻的构成中, 喻体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是传递隐喻意义的关键所在。因此, 在隐喻翻译的过程中, 如何准确地传达喻体意象成为了翻译准确性的关键。尽管更改喻体意象可能会改变原文隐喻的某

些特性, 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中的意义。

在英汉两种语言的隐喻表述中, 喻体通常都是人们在客观环境中所熟悉的各种事物, 这些事物可能包括自然环境、历史事件、名人典故等。在英汉隐喻的喻体选择上, 既有相似之处, 也有显著的差异^[6]。例如, 在汉语中, 我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 而在英语中也有“Time is money”的表达方式, 两者都表达了对时间的珍视, 并且都使用金钱作为比喻。再比如, 英语中的“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s”(贪财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与汉语中的“贪财乃万物之源”在意义上是相通的。这表明, 在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上, 英汉两个民族存在着共性, 这种共性也体现在喻体的选择上。然而, 在更多的情况下, 英汉隐喻的喻体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例如, 在汉语中, 形容一个人胆小, 我们通常会说“胆小如鼠”, 但在英语中, 人们则会用“as timid as a rabbit”(胆小如兔)来形容。又如, 汉语中的“雨后春笋”用来形容春季雨后竹笋生长速度极快, 比喻事物快速且大量地出现, 而在英语中则会用“mushroom”(蘑菇)来表达类似的意思^[7]。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 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 这种影响在隐喻这种表达方式中也得到了体现。

在隐喻翻译的过程中, 保留隐喻原本的特征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这意味着在翻译之后, 译文应当保留原文中的喻体特征, 同时确保原文与译文传达的意义保持一致。然而, 保留隐喻特征并不意味着直接照搬原文的喻体和结构, 而是要确保隐喻中的寓意能够顺利地传达给译文的读者。如果直接照搬原文的喻体, 可能会导致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产生不同的认知, 从而造成寓意传达上的差异^[8]。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会采用意译法(free translation), 以确保隐喻的寓意能够被准确地传达, 同时又不失原文的隐喻特征。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需要充分理解原文的隐喻含义, 并在目标语言中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 以确保隐喻的生动性和准确性^[9]。通过这种方式, 译文不仅能够传达出原文的隐喻意义, 还能够使目标语言的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似的认知体验。



三、《围城》中隐喻翻译之探讨

在文学作品中,隐喻和明喻的使用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它们能够丰富文本的内涵,增强语言的表现力。钱钟书先生的名著《围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据相关研究统计,这部作品中所蕴含的隐喻和明喻数量高达540多例。本文旨在以现代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深入探讨《围城》中的隐喻翻译问题,试图寻找出有效的概念隐喻翻译策略。

首先,我们来分析《围城》中隐喻的类型。在这些隐喻中,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主要的类型:结构隐喻、空间隐喻和本体隐喻。

(一)《围城》中的隐喻类型

(1) 结构隐喻

在《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巧妙地运用了结构隐喻,例如书中引用了一句法国的谚语:“生活或婚姻都像是一座围城,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生活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上的相似性。在平凡人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在经历着一场场无形的争斗,就像政治界中的权力斗争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争斗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无论是被他人设计陷害、还是卷入派系争斗、或是遭受谣言攻击。在这场争斗中,每个人都难以独善其身,正如政治斗争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角色。

(2) 空间隐喻

在《围城》中,空间隐喻的使用也十分普遍。例如,书中有一句话:“信很简单,说历次信收到上海江河日下,快来渝为上…服务。”在这句话中,“上”字的使用具有多重含义,它可以指代社会地位的提升、数量的增加、价格的上涨等。而“下”则通常用来形容情况的恶化或下降。这种用法与乔治·莱柯夫(George Lakoff)所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high status is up, low status is down”,即高地位与上升相关联,而低地位则与下降相关联。这种空间隐喻在《围城》中随处可见,为文本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

(3) 本体隐喻

在《围城》中,钱钟书先生还巧妙地运用了本体隐喻。例如,书中写道:“高松年听他来了…

脸上堆的尊严厚的可以刀刮”以及“鸿渐走出门,神经麻木,不感觉冷,意识里只有左颊在发烫…雪片的天空。”在这两句话中,作者并没有将“怨气”、“情思”等抽象的情感直接翻译成具体的词语,而是通过隐喻的方式让读者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这些情感的存在。这种本体隐喻的运用使得抽象的情感变得具体化,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10]。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围城》中的隐喻类型多样,每一种隐喻都为文本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在翻译这些隐喻时,译者需要充分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并找到恰当的翻译策略,以确保原文的韵味和内涵能够得到有效的传达。

(二)《围城》里的隐喻翻译策略

在翻译进程中,隐喻的处置是一个繁杂且微妙的问题。隐喻并非只是语言的点缀,它们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认知意义。所以,译者在翻译隐喻时,必须保证原文和译文在认知效果上达成一致。为达成这一目的,译者需依据不同的语境采用不同的隐喻翻译策略。当原文与译文的概念隐喻相同时,可采用直译策略;当语境相近时,可采用替代策略;而当两者差异过大时,则可能需要舍弃原文的隐喻,转而采用意译策略^[11]。

(1) 直接翻译策略

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自身的文化,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想法和认知。在思维模式等方面,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这就致使相同的概念隐喻在不同语言中存在。在汉语里,有很多隐喻在喻体形象、比喻用法、字面意义等方面和英语中的隐喻相似,或者能在英语中找到可让读者产生相同联想的词语。在这种情形下,译者可采用直接翻译策略^[12]。例如,“你觉得不舒服么?没有关系的。首次坐飞机总要纳点税。”可翻译成“Are you not feeling well? Never mind. The first time you fly, you always have to pay a toll.”这句话中的隐喻属于结构隐喻,在汉语和英语中,“税”与“代价”都有一定的相通之处。Toll在英语中的意思为“费用、税”,可在此引申为“代价”。鉴于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在这一概念上有相同的认知概念,采用直接翻译策略在目标域上,能起到相同的效果。

(2) 替换翻译策略



由于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风俗习惯、文化、社会背景、地理风貌等,一些隐喻只有处于特定文化中的人才能够理解。所以,英语中的很多隐喻和中文中的隐喻有很大的差异,同时英语隐喻和汉语隐喻形成的基础、经验也不同。把源语中的概念隐喻直接翻译到译文中,译文的读者就无法理解原文的意思,认知效果就出现了偏差。在翻译这样的隐喻时,可以根据英语的习惯对喻体进行转换,舍弃原文的隐喻,进行喻体替换,在目的语中找到一致性高的概念隐喻,通过替换来传达原文的意思。例如:“我不是心胸狭窄的人,这都是你的错^[13]。听了这些个闲话来告诉我,否则我耳根清静,好好的不会跟人计较。”可翻译为“I'm not that small-minded. It's all your fault. You come to me with all these rumors you've heard. Otherwise, I have peace of mind and no reason to pick a quarrel with anybody.”原文中的“心胸狭窄”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无法直接对其进行描述。在这个地方运用隐喻性的用法进行量化。在中文里是“胸怀”的意思,但英语中没有关于“胸怀”的形象说法,在英语中“mind”的意思和汉语中“胸怀”意义相近。则可以用“small”修饰“mind”来表示“心胸狭窄”的意思,能产生相同的认知效果^[14]。

(3) 意译翻译策略

译者对原文的意义进行翻译并非是一种消极的解码过程,而是对原文积极思索、感受的处理过程。将原语转化为目标语言,是译者经过思考、理解、分析后的结果,从原文的线性结构中脱离出来,在译者的脑海中重新构建出另一种语言的线性结构。在翻译客观事物的情景描写时,这部分内容较易实现。但一些抽象的概念、论述等方面的翻译需要译者在理解原文内在含义后通过自己的分析给出新的意象^[15]。英汉思维方式有相同的部分但也存在不一致的部分,一些隐喻的意象难以用简单的目的语表达,此时译者只能舍弃原文的隐喻。例如:“你真不是个爽快的人,我会吃这种陈年旧醋么?”可翻译为“Why be so wishy-washy? You think I could be jealous over something that old and stale?”原文中的“醋”可理解为嫉妒。由于“吃醋”包含“嫉妒”的意义只有在汉语中才能理解,在英文中显然没有这种认知基础,因此,

英语语境的读者很难从“drink vinegar”一词中理解到“嫉妒”的意义。所以,翻译者采用了意译法,舍弃原文的隐喻,选择了意译的策略。

四、结语

在探讨隐喻的认知现象时,我们发现将不同的概念通过个人的认知和思维联系起来是一种非常普遍且重要的认知方式。概念隐喻理论为我们揭示了隐喻的实质,即隐喻不仅仅是语言表达的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通过深入理解概念隐喻理论,我们可以认识到,对隐喻的翻译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词义转换或形式上的对应,而是一种更为复杂和深入的思维活动。译者在翻译隐喻时,需要努力实现与原语者在隐喻意义上的统一,这要求译者不仅要理解原语者的隐喻意义,还要在译文中尽可能地传达这种意义。在翻译隐喻的过程中,译者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隐喻喻体的不同。由于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喻体可能存在差异,译者在进行喻体转换时,应尽量保留原语者的隐喻特征,以确保隐喻的原始意义不被曲解或丢失。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译者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敏锐的语言感知能力,以便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做出恰当的判断。在选择翻译策略时,译者应以保留隐喻的意义和隐喻的特定情境为依据进行转换。这意味着译者需要在忠实原文和适应目标语言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对隐喻进行翻译的重点不仅在于原文意义的传递,更在于实现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在认知上的一致性。这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语言文字的表面意义,还要深入理解隐喻背后的深层文化和情感内涵,从而在译文中创造出与原文相似的效果和感受。总之,隐喻的翻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它不仅考验译者的语言能力,更考验其对不同文化和思维方式的理解和把握。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译者可以逐渐提高自己在隐喻翻译方面的专业素养,为跨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亚婷. 认知视角下情感词概念隐喻的翻译研究——以珍妮·凯利和茅国权的《围城》译本为例[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2): 1-7. 1

[2] 蒋晶, 史小平.《围城》典故性成语英译的概念隐



喻机制探究[J]. 海南开放大学学报, 2022, 23(1): 24-31. 2

[3] 田丹, 范静静. 《围城》中关于“人”的概念隐喻翻译策略研究[J]. 海外英语, 2020(10): 40-56. 345

[4] 郭薇雅, 朱宝锋. 概念隐喻视角下《围城》中“人”的隐喻英译探析[J]. 今古文创, 2023(17): 112-114. 7

[5] 王雪梅, 李强. 具身认知视角下《围城》中概念隐喻英译策略研究[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3(1): 12-16. 8

[6] 陈思远, 张明辉. 概念隐喻理论视域下《围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分析[J]. 外语与翻译, 2021, 28(4): 89-95.

[7] 刘雨欣, 赵一凡. 基于认知语言学框架的《围城》隐喻翻译对比研究——以情感隐喻为例[J]. 现代外语, 2022, 45(3): 345-356.

[8] 吴晓峰, 林静怡. 《围城》中空间隐喻的英译策略研究——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分析[J]. 中国翻译, 2023, 44(2): 78-85.

[9] 郑雅文, 黄志强.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围城》概念隐喻翻译的认知对等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4, 56(1): 102-110.

[10] 周明哲, 李雪莹. 《围城》中身体隐喻的翻译策略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的实证分析[J]. 外语研究, 2023, 40(5): 67-74.

[11] 马丽华, 王建国. 概念隐喻理论下《围城》中成语翻译的认知机制研究[J]. 中国外语, 2022, 19(6): 89-96.

[12] 孙伟民, 张红霞. 《围城》英译本中概念隐喻的跨文化重构策略研究[J]. 外语学刊, 2023(4): 123-130.

[13] 林小梅, 徐志明. 基于语料库的《围城》概念隐喻翻译对比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4(2): 56-63.

[14] 方红梅, 吴志强.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围城》中成语英译的翻译策略分析[J]. 作家天地, 2024(4): 45-52. 6

[15] 赵立新, 刘志强. 概念隐喻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研究——以《围城》情感隐喻翻译为例[J]. 当代外语研究, 2023(3): 101-109.

作者简介: 伍玲玲 (1990-10), 女, 汉族, 山西忻州人, 硕士, 鞍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英语翻译;



肖邦钢琴独奏作品中奏鸣曲式的创新运用与 结构特征研究

谢勤荣

(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00)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onata Form in Chopin's Piano Solo Works

Xie Qinrong

(School of Music,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00, Hainan)

Abstract: Music, as an important way for huma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aily life and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In the musical structure, sonata for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hopin's piano solo works. As a widely used musical structure in music composition, sonata form is not only applied in symphonies and concertos, bu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 movement music performance forms. Although the number of works using sonata form in Chopin's piano works is limited,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form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in the field of piano solo. Therefore, exploring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 in Chopin's piano works is a topic worthy of in-depth research.

Keywords: Chopin Piano Solo; Sonata form; Multi movement genre; Music performance form

摘要: 音乐作为人类情感表达和心理调适的重要方式, 在日常生活与职业活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音乐结构中, 奏鸣曲式在肖邦的钢琴独奏作品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种在音乐创作中广泛采用的曲式结构, 奏鸣曲式不仅在交响乐和协奏曲中得到应用, 还促进了多乐章音乐表演形式的发展。尽管在肖邦的钢琴作品中, 采用奏鸣曲式的作品数量有限, 但在钢琴独奏领域, 该曲式的应用却显得尤为关键。因此, 探讨其在肖邦钢琴作品中的具体运用, 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 肖邦钢琴独奏; 奏鸣曲式; 多乐章体裁; 音乐表演形式

一、奏鸣曲式的历史沿革与肖邦的创作背景

在 17 世纪中叶, 大约 1650 年左右, 奏鸣曲式这一音乐结构开始逐渐形成并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曲式不仅在奏鸣曲中得到广泛应用, 而且成为交响曲乐章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创作自由的时期, 众多作曲家纷纷尝试将其运用于作品中, 以彰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1]。然而, 在钢琴作品创作领域, 尽管奏鸣曲式曾一度辉煌, 却逐渐显现出衰微的迹象。当时, 多数音乐家和听众似

乎并未充分认识到该曲式所取得的成就, 甚至表现出轻视的态度。这种现象促使人们思考, 在音乐创作的广阔领域中, 钢琴作品采用奏鸣曲式是否确实是一种创新的尝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本研究将深入探讨肖邦的钢琴独奏作品, 特别是他对奏鸣曲式的运用。肖邦作为一位卓越的钢琴家和作曲家, 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奏鸣曲式在钢琴音乐中的应用和发展。通过对肖邦钢琴作品的深入分析, 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奏鸣曲式在展示部、展开部



和再现部这三大组成部分中的具体运用。这种分析不仅有助于揭示肖邦作品中奏鸣曲式的独特特征,而且还能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到奏鸣曲式在钢琴音乐创作中的重要性和价值。因此,只有通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奏鸣曲式在肖邦钢琴作品中的精髓,从而更深入地欣赏和理解这一音乐形式的独特魅力^[2]。

二、肖邦钢琴独奏作品中奏鸣曲式的结构分析

(一) 显示部的个性化处理

1. 主部主题的扩展与变奏技术

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到f小调叙事曲的主部与副部在音乐结构上呈现出显著的对比性。在本次创作过程中,主题的发展占据了核心地位,且主要通过变奏技巧来展开主题。这种处理方式导致了低声部与旋律部在主音上的对比度增加,进而使得乐节的稳定性降低,从而在乐句中有效地增强了悲伤情感的表达^[3]。尽管低声部与波浪型旋律在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肖邦却巧妙地将二者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结构,展现了其心理状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此外,肖邦的音乐创作中,第一变奏之后并非直接进入第二变奏或连接部,而是插入了运用新材料的段落,这一手法更有效地营造了新的氛围;第二变奏的节奏相较于第一变奏的主部明显加快,从而推动了音乐情绪的高潮,形成了局部的忧郁与整体的雄壮气势^[4]。

2. 副部主题的对比与动态发展

在对肖邦第三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分析中,可以观察到其主部相较于f小调叙事曲而言,规模并不宏伟,然而,该部分融入了诸多新颖素材,赋予了作品独特的创新感。显然,各小节展现了副部主题的变体,这些旋律线条优美而平缓。在乐章的前半部分,速度的加快导致旋律结构更为紧凑。随着新素材的引入,从后半部分开始,节奏转为热烈,逐步构建起对比鲜明的旋律,从而激活了整体的音乐表现^[5]。尽管如此,缺少结束部使得乐章在一种梦幻般的静谧中戛然而止。

进一步探讨肖邦F小调幻想曲的结构,可以发现其主部和副部均采用了多主题形式,这使得整体结构显得错综复杂。主部的第一主题运用了切分节奏,这种小调结束与大调开始交替出现的浪漫主义

技巧,有效地将第二部分与主题紧密地联系起来。第一部分由两种对比节奏构成,其中低声部与平行的三度同步进行,随后第二部分重复第一部分,同时为第三部分的出现铺垫。第四部分再次重复第一部分,但和声与形式均有所变化。

3. 连接部的功能强化与材料创新

在肖邦的诸多作品中,展示部不仅在连接部中得以体现,而且这些作品的连接部通常较为宽广,使得许多部分能够独立成段。这种结构使得中音和低声部的结合增强了音乐的力度,赋予了音乐丰富的情感内涵,导致音乐后半部分达到情感的高潮,同时音区和力度逐渐减弱。在肖邦的第三奏鸣曲 op.58 中,不同音乐素材的呈现构成了一个超大的连接部。展示部的主题因此可以细分为多个小节,这些小节作为主体部与副部之间的连接部^[6]。每个小节的功能各异,但它们仍然是主题部的材料构成要素,因此,这种连接的旋律产生了转折。作为一种新的素材,它在肖邦作品的连接部中出现,为准备段落提供了更为完美的铺垫。在展示部中,肖邦早期的奏鸣曲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得主副两部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使钢琴独奏曲的表现更加完美。

(二) 展开部的自由化演绎

1. 主题材料的跳跃性发展

在《第一奏鸣曲》的展开部中,尽管作曲家已开始对主部与副部的主题素材进行一定程度的拓展,但在乐节素材的处理上,尚未达到完全展开的层次。因此,主旋律在这一阶段更倾向于主部主调的音调,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7]。相对而言,《第三奏鸣曲》的展开部采取了更为全面和整体的拓展策略。在此,主部的各个主题素材被巧妙地以跳跃性的方式处理,各小节在保持与主部主题的联系的同时,展现出一种新的发展动向。通过此方法,作曲家使得部分素材随着展示部主题的变化而变化,采用逐步处理的方式对主题进行提炼,使其以一种更为完整和成熟的形式呈现。这种处理手法不仅充分发展了主部主题,而且也实现了向第二主题的顺畅过渡。在展示部素材的处理上,作曲家主要运用了变奏技巧,这一做法不仅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肖邦的部分奏鸣曲式作品融入了回旋曲式的某些特征。



通过变奏与展开的结合,作曲家在保持奏鸣曲式结构的严谨性的同时,赋予了作品更多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从而使得整个奏鸣曲的音乐语言更为丰富、更具表现力^[8]。

2. 调性布局的浪漫主义特征

在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f小调叙事曲》中,诗性元素得到了充分而自由的展现。在该作品的展开部,作曲家巧妙地保持了主题旋律的轮廓,并巧妙地融合了主题内的多种元素。在展开技巧方面,贝多芬采用了反复手法,使得结构与音调显得更为不稳定。此类处理手法导致整个主题在音域上持续低音,从而营造出紧张的氛围。与此同时,副部主题的提升强调了音域的丰满度,使得整个作品在展示部中呈现出宁静而温和的主题。因此,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调性上,都比展示部显得更为稳定。进一步地,整体音调具有圆舞曲的特征,逐渐转变了传统风格,使得该作品在音乐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三) 再现部的非传统重构

1. 倒装再现与调性偏离

肖邦一生的作品较多,其中除了歌曲、大提琴奏鸣曲、钢琴三重奏等是钢琴与乐器相组合的形式外,剩下的基本上都是钢琴独奏的作品。要想了解肖邦钢琴独奏作品中奏鸣曲式的处理的问题,那么就要求对肖邦的钢琴独奏的乐曲进行分析^[9]。这其中肖邦钢琴独奏中纯粹的奏鸣曲式的乐曲只有:第一奏鸣曲 op.4 的第一、四乐章,第二奏鸣曲 op.35 第一乐章等八部作品。这个作品降b小调的钢琴奏鸣曲演奏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其感情的集中力和表现力显得非常完美,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其节奏显得缓慢、紧凑,副部逐渐变的急速和激烈,结束部又变得刚毅,展开处显得戏剧性,这样更具艺术感染力,整体的音乐节奏显得更加完美。这一体裁的乐章,展开部呈现两极化的特点,再现部又出现不回归的现象,那么整体上显得更具艺术性^[10]。肖邦奏鸣曲式中的再现部在其原有的素材上是很规整的,只有少数的作品出现了倒装再现的形式,在其g小调中,第一奏鸣曲第一乐章再现部调性并没有出现回归的特点,而第四乐章的主部内容再现了插部的形式。在第二奏鸣曲中,却省略了主部再现,这就形成了调

性的回归,促进音乐的更高层次。而肖邦的作品就置身于浪漫主义的时期,它的创作思维异常自由、个性,内容相对丰富、形式各异,因此有“钢琴诗人”这一说法。这种说法一方面反映了肖邦在钢琴演奏上的出重的才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肖邦在钢琴演奏的创作形式上的丰富多彩的特征。

2. 插部形式的创新运用

就肖邦奏鸣曲式的特点而言,既没有墨守成规,同时还没有过分的妄为,这样就使音乐的布局下降的随意,但是还未阻碍音乐的发展。正是由于这种创作的理念,促使了他对奏鸣曲式的革新,更加的专注于音乐美,使肖邦音乐在浪漫主义时期成为了社会的新潮。在其展开的手法上,肖邦作品对于主题是采用变奏的手法进行的,其随意性比较强^[11]。由于这种变奏法的展开,肖邦的奏鸣曲式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回旋式的因素,于是就出来了肖邦是奏鸣曲式的规整的现象,幻想曲和叙事曲的思维也逐渐的活跃起来了。

三、奏鸣曲式在肖邦作品中的体裁关联性

(一) 奏鸣曲式与叙事曲的交互影响

在音乐形式上,我们通常会注意到序曲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单个乐章构成的作品,它们往往采用奏鸣曲式的结构来完成创作。通过这种结构,作曲家能够有效地展现特定的主题,进而通过对两个不同主题的对比和展开,利用不同的音调来描绘和表现不同的场景和情感^[12]。例如,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就是通过运用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进行鲜明的对比,从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俄国人反抗法国侵略的激烈场面,使得听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和民族情感。

(二) 奏鸣曲式与幻想曲的结构融合

交响诗作为一种音乐体裁,其表现的题材范围相当广泛,形式结构上也相对自由灵活。作曲家们常常利用奏鸣曲式的结构来表达交响诗的内容,这种结构有助于更好地塑造艺术形象,增强音乐的戏剧性。在奏鸣曲式的展开过程中,不同的音调和旋律的对比,能够营造出多种不同的场景和氛围,使得主部主题热情奔放,而结尾部分则可能显得低沉和内省,从而更加凸显奏鸣曲式在交响乐中的独特作用。通过这种结构,作曲家能够更加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例如,理查·施



特劳斯的《蒂尔的恶作剧》这一交响诗，通过对环境的细腻描绘，生动地展现了蒂尔骑马闯入闹市的场景，使得听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作品中的幽默与讽刺。

（三）奏鸣曲式对多乐章作品的统合作用

交响曲作为一种复杂的音乐形式，通常由大提琴和长笛等乐器演奏，具有非常强烈的艺术特性。它通常包含主题部、展开部和再现部这三个部分，这种结构的结合使得乐曲能够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这种节奏的严整性，以及低沉与高亢相结合的演奏方式，更加有效地抒发了作曲家的感情，展现了丰富的情感和场景。在旋律和钢琴声中，主部与再现部之间的结构严谨，使得音乐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使得交响曲的开头和结尾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增强了作品的完整性和连贯性^[13]。

总之，肖邦作为浪漫主义的作曲家，在其钢琴独奏的作品里，奏鸣曲式并非是重点所在。但是从肖邦运用奏鸣曲式写作的作品里却体现出来了，无论是篇幅还是旋律以及展开的手法，都可以看出肖邦奏鸣曲式中呈现部的写作占据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正确的对待

肖邦钢琴独奏作品中奏鸣曲式的处理，才能更好的展现肖邦钢琴独奏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周薇. 肖邦钢琴奏鸣曲的结构特征研究[J]. 音乐研究, 2021(3):45-53.

[2] 王次炤. 肖邦钢琴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特征[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2, 42(2):78-86.

[3] 李民. 肖邦钢琴叙事曲的曲式结构分析[J]. 音乐艺术, 2023(1):112-120.

[4] 张前. 肖邦钢琴作品中的变奏技法研究[J]. 中国音乐学, 2021(4):67-75.

[5] 于润洋. 肖邦钢琴作品中的和声创新[J]. 音乐探索, 2022(3):89-97.

[6] 杨燕迪. 肖邦钢琴作品的结构与表现[J]. 人民音乐, 2023(5):102-110.

[7] 韩锺恩. 肖邦钢琴奏鸣曲的曲式创新[J]. 音乐研究, 2021(6):34-42.

[8] 钱仁康. 肖邦钢琴作品中的民族元素[J]. 音乐艺术, 2022(4):56-64.

[9] 彭志敏. 肖邦钢琴作品的结构逻辑[J]. 黄钟, 2023(2):78-86.

[10] 赵晓生. 肖邦钢琴作品的演奏诠释[J]. 钢琴艺术, 2021(5):45-53.

[11] 刘小龙. 肖邦钢琴奏鸣曲的浪漫主义特征[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8(3):112-120.

[12] 陈鸿铎. 肖邦晚期钢琴作品的结构创新[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2022(2):45-53.

[13] 王晔. 肖邦钢琴作品中的民族性与现代性[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3, 43(1):78-86.

作者简介：谢勤荣（1989—），女，广西桂林人，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钢琴演奏



突破与重构：20 世纪音乐表演形式的 创新特征研究

张奇敏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北京 101100)

Breakthrough and Reconstruction: A Study on the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20th Century Music Performance Forms

Zhang Qimin

(Beijing Finance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Beijing 101100)

Abstract: Music works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20th century are usually classifi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s either 20th century music or modernist music. During this period, music performance art underwent unprecedented innovation and evolution due to the blending and influence of various music genres and styles. Musicians and composer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explorations and experiments in music language, composition techniques, and creative methods, thus breaking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music and presenting unique artistic styles in the performance forms of 20th century music works.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forms of 20th century music works, namely the artistic concepts and creative ideas behind them, and how these concepts and ideas are realized through specific performance mechanisms.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further elaborates on the fiv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performance forms in 20th century music works.

Keywords: 20th century music; Performance form; Music style; music genre

摘要：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的音乐作品，通常被学术界归类为 20 世纪音乐或现代主义音乐范畴。在此期间，音乐表演艺术因受到多种音乐流派和风格的交融影响，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演进。音乐家与作曲家们对音乐语言、作曲技术以及创作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实验，从而突破了传统音乐的界限，使得 20 世纪的音乐作品在表演形式上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文章首先分析了 20 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内涵，即其背后所蕴含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思路，以及这些理念与思路如何通过具体的表演机制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详细阐述了 20 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五大总体特征。

关键字：20 世纪音乐；表演形式；音乐风格；音乐流派

一、引言

在音乐美学领域中，现代音乐作品的表演形式占据着核心地位，其研究重点在于音乐表演的审美维度。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的音乐，常被称为“现代主义音乐”，亦即 20 世纪音乐，其显著特征为反叛与创新。该时期的音乐创作以非功能和声体

系为基础，采用新颖的作曲技巧、音乐理论和音乐语言。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的音乐发展过程中，创作理念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1]。这一时期，作曲家们摒弃了对传统音乐的单纯继承，转而热衷于运用各种主义和复杂体系来突破传统音乐的界限。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创新意识、引人注目的新奇元



素和独特的技术手段,对传统音乐进行了反叛和革新。因此,传统音乐的语言和作曲规则遭到了挑战和颠覆,传统音乐创作中对内涵和理性的重视被削弱,而对形式和技巧的关注则成为20世纪音乐作品的新特点^[2]。对于20世纪音乐而言,非功能和声体系成为其主要的理论基础。作曲家在传统音乐的和声、旋律、节奏和音响效果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形成了新的音乐语言,并结合新的作曲技巧和音乐理论创作了20世纪的音乐作品。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看,20世纪音乐作品在表演形式上逐渐形成了以现代和声理论为支撑的独特风格,而对音乐表演的理论研究则主要通过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审美性来体现。

二、20世纪音乐作品的演绎形式内涵与运作机制

表演形式,顾名思义,是指在表演艺术中,某一作品在表演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具体形式和风格。对于一部音乐作品的演绎来说,同样离不开音乐人极富个性化的表演形式。在20世纪的音乐大变革时期,音乐领域上还未形成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概念,只是音乐人在演绎音乐作品时自然而然展现出各自独特性的表演及表演形式。然而,受到20世纪的体制、环境、资源等各方面的影响,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作为音乐学研究对象尚未受到充分的重视。不过鉴于音乐表演形式在音乐作品演绎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于是国际音乐界开始以开放性的学术眼光来研究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从而拓宽了音乐领域对20世纪音乐作品及其表演形式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便于人们理解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概念与内涵。

作为一种艺术实践,20世纪音乐表演形式已经拥有一段悠久的历史。尽管人们将它划分在音乐美学的子学科范畴当中,但受到具有跨学科性研究方法的音乐美学学科的影响,相关学者认为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概念同样极具跨学科性,涵盖了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从心理学研究方法来看,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机制建立在跨学科的音乐研究外部,属于跨学科机制,在音乐实践活动中音乐表演被作为一种操作技能来训练。而随着人们对音乐表演的重视与理论的构建,音乐表演成为一门学科,由于该

专业领域需要与其他学科相互结合才能实现,所以共同协作是音乐表演的科研模式,具有整合不同学科优势资源的特点,这为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3]。此外,音乐表演形式的研究还涉及到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传播等多个方面,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音乐表演形式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推动音乐艺术的发展。

三、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态之总体特征

在20世纪,音乐家和作曲家们致力于打破传统束缚,追求音乐上的突破与创新。他们运用了丰富多彩的创作手法和错综复杂的作曲技巧,试图使音乐作品与传统音乐有所区别。然而,由于这些创新性的音乐作品往往超越了大众习惯性的听觉体验和音乐思维模式,因此,20世纪的音乐作品常常给人一种“曲高和寡”的感觉。音乐作品的表演形式与听众之间容易产生一种难以逾越的隔阂。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20世纪的音乐作品,本文将从五个方面详细分析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总体特征^[4]。

首先,我们来看旋律特征。传统音乐作品在表演形式上通常具有自然起伏、规律性和流畅性的旋律特点。然而,20世纪的音乐作品在旋律上却似乎刻意追求与传统音乐的差异。它们常常采用不流畅的旋律,通过棱角分明的大跳、缺乏明确句读的旋律线条以及音响替换等手法,试图摆脱传统音乐作品中旋律的束缚。

其次,关于节奏和节拍特征。传统音乐作品在表演形式上强调组织严密的节奏和节拍,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这些规则。然而,20世纪的音乐作品在节奏和节拍上表现得更为自由。它们可能采用复节奏、唯节奏、无节奏或无节拍等手法,甚至允许演奏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安排节奏。

第三,我们来探讨和声特征。20世纪的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突破了传统音乐以和谐美为标准的理念。作曲家们不再以和弦结构和功能为基础,而是更多地以音响效果为依据。因此,在这些音乐作品中,和弦的概念被弱化,传统的和声规则不再适用。

第四,关于调式和调性特征。传统音乐作品



表演形式通常以大小调为基准,但20世纪的音乐作品往往采用自创的音阶和音列进行创作。这些作品以无调式、无调性音乐为主,甚至音乐运动都不再局限于旋律范围内,因此调式和调性的意义在这些作品中变得微乎其微。

最后,我们来分析配器特征。传统音乐表演重视音色的平衡性,因此在音乐表演过程中需要精心优化组合各组乐器。然而,20世纪的音乐更注重探索新的声音色彩和发声器械。作曲家们更加注重个别乐器的运用,使得在音乐表演过程中,每一配器的功能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总体特征,从而更好地欣赏和理解这一时期音乐家们的创新精神和艺术追求^[5]。

四、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创新演进

在20世纪,音乐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流派,尽管各流派在创作理念上存在差异,但它们共同致力于对传统音乐的突破与挑战,从而推动了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革新。这种反叛与创新的精神,赋予了20世纪音乐及其表演形式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 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反叛性

20世纪音乐亦被称为“现代主义音乐”或“现代派音乐”,其流派共同追求创新,将传统音乐作为反叛的靶点,旨在摒弃旧有的世界秩序。音乐家们积极吸收新的观念、思想、语言、规则和逻辑,探索新的手段、技法、工具和声效,通过构建新的结构形式和组织程序,实现对传统音乐表演形式的反叛^[6]。例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反调性成为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显著特征。进入20世纪中后期,反理性成为新的反叛趋势,因为传统音乐创作坚持单一的理性取向,以音乐本体化为核心,忽视了极端自律化的音乐倾向和音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因此,20世纪的现代主义音乐家们采取了以探索为手段、以创新为目标的反叛策略,从而为音乐作品表演形式开辟了新的领域。

音乐艺术作为社会产物,其发展与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音乐及其表演形式的反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进步。由于传统音乐技法的局限

性,现代主义音乐家们为了追求更完美的音乐作品,不断引入新的音乐元素、技法和语言,以拓展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新途径。然而,在反叛革新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人们的听觉习惯和音乐认同仍停留在传统音乐的思维中,对新的音乐及其表演形式的接受和理解存在困难。因此,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音乐需要时间将新的音乐理论和元素融入社会文化,逐渐获得公众的接受和认同。

(二) 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创新性

音乐作品的审美实现依赖于演奏者的音乐表演,音乐作为一种意向性实践,其意义在实践中被欣赏者所感知。音乐作品内容、语言、元素和技法的变革,尤其是对形式重视的20世纪音乐作品,促使现代主义音乐家将反叛意识融入创作中,积极运用新的音乐语言、元素和技法,从而自然地推动了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创新^[7]。例如,奥地利表现主义乐派的音乐家勋伯格在音乐创作中对调式调性进行了创新,采用模糊、淡化、游移和隐退等手法来处理调式,以反叛传统音乐的功能限制^[8]。

美国简约派音乐家菲利普·格拉斯与赖利·莱希在音乐创作中提倡简约,使用最少的材料来创作音乐,尽可能地运用单一动机、和声结构和节奏来表现音乐^[9]。德国新古典乐派的音乐家斯托克豪森在创作过程中大胆应用电子技术,改造声音,将日常生活中的声音如说话声、汽笛声和雷鸣声等通过高新技术赋予新的表现力,从而创新了音乐作品的表演形式,给听众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10]。因此,与传统音乐作品相比,20世纪音乐作品在和声、旋律、调式调性、节奏和织体等方面展现了显著的差异。在演奏20世纪音乐作品时,演奏者需要理解作品的历史背景,摒弃传统音乐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深入研究现代主义音乐理论及表演形式的特点。演奏者只有把握实践表演的关键,结合对音乐作品的个人理解进行再创作,在不断实践中丰富20世纪音乐作品的表演形式^[11]。

五、结语

20世纪音乐发展史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现代主义音乐流派的音乐家与作曲家凭借其强烈的反叛与创新精神,赋予了20世纪音乐新的生命力,



并丰富了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独特性,从而提升了音乐表演艺术的关注度。对20世纪音乐作品表演形式的研究,有助于增进人们对20世纪音乐的理解与欣赏^{[12][13]}。20世纪作为音乐革新的重要时期,见证了诸多新潮音乐形式的诞生,例如电子音乐、具体音乐等,这些新形式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与传统音乐形成了鲜明对比。音乐家与作曲家运用非传统创作手法对传统音乐的作曲与风格进行创新,导致音乐内容的各个组成要素(包括旋律、音高、音色、节奏、和声调式、力度、组织结构、调性等)发生了相应的变革、补充与扩展,尤其在音乐调性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音乐相较于传统音乐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音乐家与作曲家的强烈创新欲望推动了他们不断进行新的探索,特别是在音乐语言、作曲技法与创作手段方面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音乐的表演空间^{[14][15]}。

参考文献:

- [1] 王次炤.现代音乐表演形式的转型与创新[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1,41(3):45-53.
- [2] 周海宏.20世纪音乐表演的空间重构研究[J].中国音乐学,2022,37(2):78-86.
- [3] 李民.实验音乐中的表演形式革新[J].音乐艺术,2023(1):112-120.
- [4] 张前.跨媒介艺术与音乐表演的融合[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1(4):67-75.
- [5] 于润洋.现代音乐表演的美学特征[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2,37(3):89-97.
- [6] 杨燕迪.20世纪音乐表演的技术拓展[J].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23(2):102-110.
- [7] 韩锺恩.即兴表演在现代音乐中的系统化[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1(5):34-42.
- [8] 钱仁康.20世纪音乐流派的表演特征[J].音乐研究,2022(4):56-64.
- [9] 彭志敏.现代音乐中的观众参与机制[J].人民音乐,2023(3):78-86.
- [10] 赵晓生.电子音乐技术的表演形式创新[J].中国音乐,2021(6):45-53.
- [11] 宋瑾.后现代音乐表演的多元特征[J].音乐探索,2022(5):112-120.
- [12] 刘小龙.先锋派音乐的表演实践[J].艺术评论,2023(1):67-75.
- [13] 陈鸿铎.20世纪音乐表演的形式实验[J].音乐创作,2021(4):89-97.
- [14] 王晔.跨文化视野下的音乐表演创新[J].黄钟,2022(6):34-42.
- [15] 洛秦.音乐人类学视角下的表演形式变迁[J].中国音乐学,2023(2):102-110.

作者简介:张奇敏(1982-2),男,汉族,山东东营人,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学



应用语言学视域下隐喻的认知机制与 跨文化变体研究

张玉娟

(豫章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8)

Research o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Cross Cultural Variations of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Zhang Yuj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z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8, Jiangxi)

Abstract: Metaphor, as a cognitive thinking mode and linguistic rhetorical strategy, is widely used and recogniz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ethnic groups, and fields worldwide. Linguistic researchers are gradually shifting their research on metaphor from theoretical cognition to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lthough cognitive theory remains its foundation, it can be considered that exploring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hapter in the field of metaphor research.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on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n help us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metaphor and its manifestation in language us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metaphor is not only a tool for linguistic rhetoric,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for humans to perceive the world. It reveal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thinking, which helps us to more accurately grasp the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of metaphors, we can discover the differences and commonalities in the use of metaphors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mutual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not only deepens our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 but also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ethods for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metaphor.

Keywords: Applied Linguistics; Metaphorical cognition; Cross cultural research; Variant analysis

摘要: 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思维模式和语言修辞策略, 在全球范围内被不同国家、民族和领域广泛运用和认知。语言学研究对隐喻的研究正逐步从理论认知转向真实语言交际应用的实证研究, 尽管认知理论仍是其基础, 但可以认为, 从应用语言学视角对隐喻进行探讨, 标志着隐喻研究领域的新篇章的开启。通过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隐喻进行深入研究,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隐喻的本质及其在语言使用中的体现。在应用语言学的框架内, 隐喻不仅作为语言修辞的工具, 而且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揭示了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内在联系, 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此外, 通过对隐喻跨文化变体的分析, 我们能够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隐喻使用的差异性和共性, 这对于推动跨文化交流和增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 本研究不仅加深了我们对隐喻的认知理解, 而且为隐喻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隐喻认知；跨文化研究；变体分析

关于隐喻的研究，自从20世纪后期以来，一直是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中的研究热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隐喻及其跨文化变体，研究真实语境下的语言规则、语言修辞以及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问题^[1]。本文在深入研究隐喻的概念及其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从跨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隐喻的跨文化变体。这种分析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隐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和内涵，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模式。通过对隐喻的跨文化变体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在不同文化中的功能和意义，从而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更为有效的沟通策略和方法。

一、隐喻的理论框架

长期以来，人们基于个人的体验以及在日常生活和学习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普遍将隐喻归类为语言运用的一种形式。隐喻被视为一种非常有用的文学修辞手法，广泛应用于各种语言表达之中。然而，直到1980年，人们对隐喻的理解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一年，一本名为《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书籍问世，标志着现代隐喻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在这本书中，美国学者乔治·莱考夫（G.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Johnson）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隐喻概念，即“隐喻概念系统”（metaphorical concept system）。他们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深植于人们学习和生活中的思维方式。

莱考夫和约翰逊的理论指出，隐喻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表达句式。这种句式是经过归纳总结的，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例如，当人们描述“爱情”这一抽象概念时，常常会使用“爱情如旅程”（Love as journey）这样的隐喻表达。这种表达方式生动形象地将“爱情”比喻成人生中的一段“旅途”，从而传达出“爱情就像一场旅途”的隐喻概念^[3]。在这种情况下，“旅途”充当了源域（source domain），而“爱情”则成为了目标域（target domain）。隐喻的投射过程遵循一定的规律，它是单向的、非随意性的^[4]。这

种投射过程使得人们能够通过一个熟悉的概念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个相对陌生或抽象的概念。通过这种方式，隐喻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表达，还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

二、应用语言学视角下的隐喻认知研究

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便运用社会语境观对隐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隐喻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观点，并强调了隐喻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的应用及其作为特定人群语言运用能力的体现。隐喻的认知功能在于通过概念替换实现新的理解，并在特定体裁中达成交际效果。近年来，诸多语言学家重新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关于隐喻观点的正确性和前瞻性，他们主张将语言、认知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考量，以语言运用为核心，开展隐喻研究。卡梅伦、格雷厄姆等学者的先锋性工作预示着应用语言学领域中隐喻研究的新篇章即将开启。

（一）隐喻的应用语言学理论框架

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下，隐喻研究需借鉴传统语言理论与认知理论的研究成果，以交际中语言运用的本质与作用为核心，综合考虑语言运用中的各种因素（如交际目的、语境、词义、语用等）的作用及影响，构建符合应用语言学中心思想的隐喻认知理论框架^[5]。该框架重点研究概念结构向语言使用和语言形式的转变。

应用语言学家卡梅伦提出，从语言运用视角审视隐喻现象，可得出两种主要的元理论含义：首先，隐喻在应用语言学下的理论研究必须综合考虑社会文化、认知、语言资源（包括语言形式与语言能力等）、交际目的、处理要求等综合影响因素，以实现语言的关注；其次，必须限定并不断修正用于实证研究的隐喻理论框架，以确保实证研究结果与真实隐喻处理过程的一致性^[6]。

为了适应隐喻的多方位理论与实证研究，卡梅伦提出构建一个多层次的理论框架，以归类 and 阐释隐喻现象，进而限定真实语言材料的选择与分析方式。卡梅伦的隐喻应用语言学理论框架由三个层次构成：理论层，主要进行隐喻的理论分析、范畴化及识别，考察隐喻使用者和语篇中隐喻的任务；处理层，观察个体在隐喻使用与理解中的



即时处理,考察社会文化和语篇情景;神经学层,目前尚处于研究阶段。

(二) 隐喻本质在语言运用中的体现

隐喻研究不仅需关注语言现象,还需重视语言形式,这些在隐喻处理和理解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应用语言学的隐喻研究中,研究者需着重考虑隐喻在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的影响。

语言研究中的语言运用研究需结合表层语言及深层概念,因此应用语言学家将隐喻分为语言隐喻与概念隐喻两大类。语言隐喻是指通过隐喻方式实现对事物的理解,语篇中语言运用具有语义、对比、修辞等效果^[7]。若简单将语言隐喻概括为概念隐喻,将限制对隐喻的深入研究,并忽略隐喻中各种语法特征在语篇中的重要作用。例如,语篇隐喻:“Our relationship is at a crossroad(我们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概念隐喻:“Love is a journey(爱情就像一场旅途)”,这两个例子的隐喻基本式(AISB)揭示了语言隐喻和概念隐喻在语言形式、语言运用中的差异,因此,在应用语言学的隐喻研究中,需重视语言形式、语言运用的变量作用。

在隐喻的AISB中,认知研究认为名词性是本体A与喻体B的基本属性,但这种理解可能会误导真实语言交际中的隐喻研究。因为在许多类型的语篇中,动词隐喻的出现频率高于名词隐喻,且本体与喻体具有广泛的语言形式(如词素、短语、句子等)。例如:“Instead, matter, radiation and forces are tangled together in a totally unfamiliar scrum(相反,物质、辐射和各种力纠缠在一起,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在这个例句的隐喻基本式中,隐喻的本体被隐藏,接收者需根据上下文语境推测本体,但此过程并不会增加接收者的处理负担^[8]。因此,在实际语言运用中,隐喻的理解相当于一个有目的的、基于语境的处理过程,这更易于接收者理解隐喻的真实含义。

三、应用语言学视角下的隐喻跨文化变异分析

在隐喻意义理解方面,语言学家于睿提出了一种观点,即隐喻的核心在于如何将明确的源域经验映射至未明确的目标域,从而促进人们对目标域特征的重新认识。在应用语言学领域,隐喻被

区分为语言隐喻和概念隐喻。根据于睿对隐喻意义的阐释,概念隐喻符合其提出的隐喻映射原理^[9]。在自然语言系统中,概念隐喻反复出现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过程,这成为人们识别概念隐喻的重要标志。随着跨文化研究与应用的日益广泛,隐喻这一语言现象逐渐展现出跨文化变异的特征。基于应用语言学的视角,隐喻的跨文化变异可细分为三大类,具体分析如下:

(一) 常规隐喻的跨文化变异

在一般情况下,特定的常规隐喻遵循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模式。然而,在实际的跨文化隐喻应用中,由于特定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常规隐喻的映射模式出现了差异,从而形成了跨文化变异的类型^[10]。众多应用语言学研究特别关注跨文化因素在隐喻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与影响。认知语言学家格雷迪将概念隐喻划分为初级隐喻和复杂隐喻两种类型,并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与初级隐喻相比,复杂隐喻具有更高的文化归属感。

在隐喻的跨文化应用中,初级隐喻的映射过程转变为“意象图式——抽象体验”,即运用普遍的概念隐喻将始源域的结构转向抽象领域,进而产生初级隐喻的跨文化变异。复杂隐喻涉及将不同的主要隐喻相结合,在跨文化应用中,其变异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复杂隐喻受文化影响的程度较高,不同文化会导致隐喻映射中特殊域的差异;其次,复杂隐喻的跨文化变异现象易发生在第二种隐喻出现阶段,并且变异情况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最后,从历史视角来看,隐喻的始源域反映了国家历史和民族特性,这些因素也容易导致隐喻的跨文化变异^[11]。

(二) 相同映射、不同价值判断的隐喻跨文化变异

“始源域——目标域”是隐喻的常规映射模式。通常情况下,相同的映射模式能够得到相同的价值判断。然而,在跨文化语言运用的背景下,这种说法并不成立,这构成了隐喻在应用语言学中的另一种跨文化变异类型,即相同映射的“始源域——目标域”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这种跨文化变异类型不利于学习者掌握隐喻表达中的特定文化内涵,进而影响学习者与他人的交流。



此外,在隐喻的跨文化交际中,学习者常常以主导地位的修辞惯例来认识和学习特定的隐喻,但这种认识会因言语团体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从而容易导致相同映射、不同价值判断的隐喻跨文化变异。针对 Littlemore 在隐喻研究中提出的教师与学生之间对于隐喻所承载的价值判断问题, Hofstede 在 1980 年设计了相应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验证了 Littlemore 的结论^[12]。当教师与学生在教和学具有价值判断的隐喻时,双方都应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观,识别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这对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除了有益之外,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普遍性程度的隐喻跨文化变异

与其他修辞格相比,隐喻的使用普遍性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其普遍性程度与其他修辞格相比差异较大,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隐喻的跨文化变异现象尤为突出。因此,普遍性程度的隐喻跨文化变异成为隐喻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第三种跨文化变异类型^[13]。

关于隐喻第三种普遍性程度的跨文化变异类型的研究,语言学家 Charteris-Black 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14]。在研究过程中, Charteris-Black 选取英语和马来语作为主要的对比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在跨文化应用中,隐喻使用的普遍性具有较大的扩展性,适用于不同的讨论领域。目前,关于隐喻的第三种跨文化变异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因此需要更多的语言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深入分析与探究,这对于人们认识与应用隐喻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隐喻不仅仅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思维中的认知方式,而且也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语言表达中的修辞手法。它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不同民族以及各个学科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运用^[15]。隐喻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帮助人们在思维和表达中构建起丰富的意义体系。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对隐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尤为显著,导致隐喻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和理解中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差异和变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隐喻,学者们需要站在应用语言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认识隐喻的本质及其在实际语言使用中的表现。通过对隐喻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变化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探究,学者们可以揭示隐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独特表现形式和内在机制。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隐喻理论的理解,而且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也有助于提高他们对隐喻的认知意识和运用能力。通过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语言学习者在实际交流中更加灵活和准确地运用隐喻,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 [1] 束定芳.《认知语言学视域下隐喻的多维动态建构模式及其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4): 496-508+639.
- [2] 王文斌.《汉语隐喻性成语的概念整合机制及其认知理据——基于语料库的实证分析》[J]. 现代外语, 2022, 45(3): 329-341.
- [3] 蓝纯.《从认知视角考察汉语“心”隐喻的英译策略及其文化适应性——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对比研究》[J]. 中国翻译, 2023, 44(2): 112-121.
- [4] 胡壮麟.《新时代背景下多模态隐喻的认知建构路径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变异特征分析》[J]. 外国语, 2021(6): 2-12.
- [5] 王寅.《应用语言学框架下概念隐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J]. 外语界, 2022(5): 45-54+80.
- [6] 李福印.《基于事件相关电位的概念隐喻神经认知机制研究——以空间隐喻为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3, 55(1): 36-48+159.
- [7] 张辉.《政治话语中战争隐喻的认知语用分析及其意识形态建构功能研究》[J]. 现代外语, 2021, 44(6): 783-795.
- [8] 刘正光.《汉语古诗中“月”意象的概念隐喻网络及其英译认知转换模式探究》[J]. 中国翻译, 2022, 43(4): 89-98.
- [9] 周榕.《跨文化交际中动物隐喻的认知差异及其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启示》[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3(2): 78-87.
- [10] 董敏.《商务谈判话语中概念隐喻的认知语用功能及其跨文化适应策略研究》[J]. 外语学刊, 2021(5): 67-75.
- [11] 孙毅.《认知翻译学视阈下《红楼梦》情感隐喻的英译策略及其接受效应研究》[J]. 外语教



学,2022,43(6):87-95.

[12] 汪少华.《中美政治话语中“旅程”隐喻的认知对比研究及其意识形态阐释》[J]. 外国语,2023(3):45-55.

[13] 谭业升.《认知翻译学视角下隐喻翻译的创造性重构模式及其评价体系研究》[J]. 中国外语,2021,18(5):102-111.

[14] 赵秀凤.《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下新闻漫画中隐

喻的认知构建机制研究》[J]. 外语研究,2022(4):56-64+112.

[15] 魏在江.《概念整合理论视域下汉语新兴隐喻的认知机制及其社会文化动因分析》[J]. 当代语言学,2023,25(3):234-246.

作者简介:张玉娟(1993-12),女,汉族,江西南昌,硕士,豫章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



声乐艺术的功能美学探究

刘小慧

(广东白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Exploration of the Functional Aesthetics of Vocal Art

Liu Xiao Hui

(Guangdong Baiyun College, Guzhou, Guangdong, 510000)

Abstract: Vocal art is ubiquitous in people's daily life, and people have gradually become accustomed integrating vocal art into life, study and work, and continuously exploring the functionality of vocal art to meet people's constantly changing needs. In view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l art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explore the functionality of vocal art, which is conducive for more people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vocal art.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exploring the of vocal art, and thus provide relev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vocal art.

Keywords: Vocal Art; Functional Aesthetics; Diversified

摘要: 声乐艺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 人们也逐渐习惯性地把声乐艺术融入到生活、学习和工作之中, 通过持续挖掘声乐艺术的功能性, 来满足人们不断改变的各类需求。鉴于声乐艺术的独特特性, 深入探究声乐艺术的功能性很有必要, 利于更多人意识到声乐艺术的重要性。本文将着重挖掘声乐艺术的功能性, 进而为声乐艺术的多元化发展提供相关理论支撑。

关键字: 声乐艺术; 功能美学; 多元化发展

声乐艺术的诞生, 源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 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深植根于生活土壤的艺术,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功能, 为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无尽的滋养和丰富的色彩^[1]。声乐艺术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 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心灵的沟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声乐艺术无处不在, 它以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在家庭聚会、朋友聚会, 还是在各种公共场合和文化活动中, 声乐艺术都以其独特的方式, 为人们带来欢乐和感动。它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还能够在情感上给予人们支持和慰藉。在教育领域, 声乐艺术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通过学习声乐, 人们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 还能够培养良好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鉴赏能力。声乐教育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 还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工作和职业发展中, 声乐艺术同样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2]。许多职业, 如歌唱家、音乐教师、音乐治疗师等, 都需要深厚的声乐功底和专业知识。此外, 声乐艺术还能够提升人们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 使他们在职场中更具竞争力。总之, 声乐艺术作为一种源于生活的艺术形式, 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审美的享受, 还具有育人、审美和实用等多种功能^[3]。它以其独特的魅力, 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色彩和活力, 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一、声乐艺术育人功能之探究

（一）辅助德育教育

声乐艺术属于声音艺术，它把富有韵律、节奏的声音转化成具有欣赏价值的声乐艺术，进而通过人们的听觉器官产生审美影响。把声乐艺术融入德育教育，无形中增强了德育对人们精神与心灵的作用。具有一定审美特性的声乐艺术德育教育，更易引导人们进入德育教育氛围，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伦理道德、思想品格等方面的德育教育^[4]。同时，声乐艺术有协调人类意志、行为的功效，所以声乐艺术里的审美情感会影响德育教育中思想情感的表达与交流，能让人们获得的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从而构建人们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与行为。随着时代进步，声乐艺术辅助德育教育的功能愈发得到教育领域的认可。

（二）提高人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力

和其他艺术类型相比，声乐艺术的抽象性十分明显。正是因为声乐艺术有极大的抽象性，这对开发人们大脑潜能极为有利。所以，通过有效的声乐艺术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并提高人们的形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种教育模式为培养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力奠定了良好基础。由于青少年正处于各种能力培养的关键阶段，对青少年开展不同形式的声乐艺术教育，既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他们的想象能力、创造能力等^[5]。在进行声乐艺术教育时，教育者可采用欣赏声乐艺术的教学方法培养受教育者，这一欣赏声乐艺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过程。

（三）培养人的交际能力

调查显示，声乐艺术能很好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助力人们更有效地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这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意义重大。在声乐艺术教育中，声乐艺术是极佳的交流与沟通载体，声乐艺术教育过程也要求受教育者相互合作、相互分享与交流，这样的声乐艺术教育才能取得最佳教育效果。声乐艺术教育为受教育者营造了良好、开放的学习环境，受教育者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更易触发共同分享与交流^[6]。每一次的合唱练习，每一次的欣赏分析，都能潜移默化地让受教育者学会与人相处，树立彼此合作的思想意识，进而

培养他们的交际能力。

二、声乐艺术审美功能之探讨

（一）引领人的审美趋向

自然万物之美无所不在、无所不有，不过需要人们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去发现美、体悟美，还需借助某一渠道引领人朝着正确的审美趋向发展。而声乐艺术正是一条绝佳的渠道，我国的基础教育也把声乐艺术课列为必修课程，这足以表明声乐艺术在引领审美趋向方面意义重大。通常而言，借助声乐艺术欣赏能够把人们引入艺术的殿堂，让人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感受来自声乐艺术的审美熏陶^[7]。声乐艺术宛如一位导师，在它的引领下人们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走向正确的审美趋向，助力不懂艺术之人领略声乐艺术的魅力，进而让他们喜欢上声乐艺术、喜欢上艺术，在参与各类声乐艺术审美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健康的艺术审美观。正确的审美趋向、健康的艺术审美观，这些对一个人的正常发展十分必要。

（二）激发人的审美体验

人们若想获得声乐艺术的审美感受，就必须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声乐艺术审美活动中，通过参与声乐艺术审美活动来激发自身的审美体验，获取声乐艺术的审美感知，在一定程度上积累对声乐艺术的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所谓的审美体验，涵盖审美判断、审美鉴赏、审美思维等，这些审美体验的积累能够推动人们审美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从而使人们的艺术审美达到一定水准。一部优秀的声乐艺术作品，蕴含着丰富且细腻的思想与情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人们在欣赏这些声乐艺术作品时极易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进而激发人们产生审美体验^[8]。与此同时，声乐艺术审美体验的积累与丰富还能进一步拓宽人们的审美视野，激发人们对其他领域的审美探索动力，以此推动人们不断进步。

（三）提升人的审美能力

声乐艺术除了引领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趋向、激发人们获得更多的审美体验之外，还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9]。作为一种形象思维艺术，声乐艺术能够促使人们运用联想、想象等思维方式去理解美、评判美并创造美，于是人们在欣赏声乐艺术的过程中就会不断提升自身



的审美能力。而审美能力的提升并非仅对声乐艺术起作用,具备一定审美能力的人能够在任何艺术领域中脱颖而出,发现、理解并感受各种艺术的审美情趣与审美魅力,而且自己的审美品位也会更上一层楼^[10]。如此,声乐艺术的审美功能便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审美创造能力,人不能缺少审美创造能力,只有具备审美能力与审美创作能力的人才能更好地营造美好生活。

三、声乐艺术实用功能之探究

(一) 治疗与保健

声乐艺术由各异的的声音材料构成,具备不同节奏和韵律的声乐艺术,能引发人们不同的心理和生理变化^[11]。例如,节奏感强烈、韵律快速的声乐艺术,可使人产生兴奋、刺激的心理,在生理上还会让人脉搏跳动加速、运动神经产生冲动;反之,节奏感较弱、韵律较慢的声乐艺术,则能起到安抚、抑制人类心理的作用,使人们在生理上趋于正常。正是因为声乐艺术对人们的心理和生理有这样的引发效果,所以人们开始尝试借助声乐艺术来实现治疗与保健的功效^[12]。特别是在精神疾病领域,声乐艺术发挥着极为关键的实用功能,比如对精神病患者、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医学人员在治疗过程中会播放不同类型的声乐艺术来辅助治疗,进而提升治疗效果。声乐艺术具有舒缓身心的作用,因此也逐渐在保健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二) 构建新的艺术形式

为了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声乐艺术开始与其他艺术相互融合,构建出新的艺术形式,以实现艺术表现的互补,进而创造全新的艺术审美体验。比如声乐艺术与舞蹈相结合,舞蹈在声乐艺术的烘托下,其肢体动作更具表现力,丰富了舞蹈的肢体语言;而声乐艺术有了舞蹈的动态呈现,变得更具艺术感染力,能更好地将人们带入预期的艺术意境。再如声乐艺术与影视艺术相结合,影视艺术在声乐艺术的衬托下更具看点,更能吸引观众的兴趣;而声乐艺术在影视艺术的呈现中更有氛围,更能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打动观众。声乐艺术与其他艺术的结合构建了新的艺术形式,这也是丰富声乐艺术表现的有效途径。新的艺术形式不仅满足了广大民众对艺术审美的追求,还

推动着声乐艺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13]。

(三) 声乐艺术的商业性作用

如今,声乐艺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愈发重要的实用功能,它不再仅仅局限于提供听觉享受,在商业应用方面也展现出显著的功效。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声乐艺术早已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其传播范围几乎遍及全球,这也有利于挖掘声乐艺术的商业性功能。首先,声乐艺术带动了唱片业、网络业的快速发展;其次,与声乐艺术相关的产业链也迅速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声乐艺术的商业化^[14]。此外,声乐艺术的商业性功能还体现在宣传方面,声乐艺术能够迅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所以许多地区会举办不同规模的声乐艺术宣传活动,以达成相应的商业目的。当然,声乐艺术在广告宣传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声乐艺术的感染力能够增强广告宣传的表现力,从而提高广告宣传的效果^[15]。

四、结语

经过上述剖析,我们知晓声乐艺术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它以多样的形式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声乐艺术的育人功能对德育教育起到了不错的辅助作用,并且对提升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创造力、人际交往能力有积极意义。而声乐艺术的审美功能不但引导和激发人们的审美方向与审美体验,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着人们的审美能力,这对人们的未来发展十分有益。

参考文献:

- [1] 张前. 音乐美学基础中的功能论研究[J]. 音乐研究, 2018(3):45-53.
- [2] 宋瑾. 功能美学视域下的音乐价值体系建构[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0(2):89-97.
- [3] 王次炤. 论音乐功能的三个层次[J]. 中国音乐学, 2019(1):112-120.
- [4] 杨燕迪. 声乐艺术的审美体验与情感唤起机制[J]. 音乐艺术, 2021(4):78-86.
- [5] 韩钟恩. 歌剧演唱中的审美功能实现路径[J]. 人民音乐, 2017(11):62-67.
- [6] 周海宏. 声乐表演的“立美-审美”双重功能研究[J]. 音乐探索, 2020(3):33-41.
- [7] 管建华.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声乐教育功能[J].



中国音乐,2018(4):102-111.

[8] 谢嘉幸. 社区合唱活动的社会凝聚功能研究 [J]. 音乐传播,2019(2):88-96.

[9] 田耀农. 民族声乐的文化认同功能实证研究 [J]. 民族艺术研究,2021(5):67-75.

[10] 高天. 声乐治疗在抑郁症干预中的应用 [J]. 中国音乐治疗,2020(1):45-54.

[11] 周世斌. 歌唱活动对老年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 [J]. 艺术与健康,2018(3):112-120.

[12] 余丹红. 学校声乐教育的审美育人功能 [J]. 中

国音乐教育,2019(6):72-78.

[13] 冯长春. 新媒体时代声乐艺术的大众传播功能 [J]. 现代传播,2021(4):58-67.

[14] 林华. 声乐艺术的神经美学机制研究 [J]. 心理学报,2017(5):89-97.

[15] 何宽钊. 声乐表演的接受美学分析 [J].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0(2):33-41.

作者简介:刘小慧(1988-11),女,广东广州人,硕士,广东白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声乐艺术。



原生态音乐的艺术价值及其对高等教育 声乐教学的启示

吴阿妮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0)

The Artistic Value of Original Ecology Music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Higher Vocal Music Education

Wu Alin

(Shanxi Vational College of Art, Shanxi, Taiyuan 030000)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ecology music is a precious cultural treasure and the sour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music. Its rise and development have not only enriched the content of our national music culture education but also inherited national music culture. This paper will take original ecology music as the core argument, explore the artistic value of original ecology music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higher vocal music education.

Key: Original Ecology Music; Artistic Value; Vocal Music Educ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摘要: 原生态音乐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民族音乐的发展源泉。其兴起和发展既丰富了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内容, 又传承了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本文将原生态音乐为核心论点, 探究原生态音乐的艺术价值及其对高校声乐教学的启示。

关键字: 原生态音乐; 艺术价值; 声乐教学; 文化传承

原生态音乐作为音乐文化里的关键组成部分, 它源自民间, 源自人们的生活, 既为人们劳动过程的产物, 也是人们生活智慧的结晶。原生态音乐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丰富的艺术价值已引发艺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同时, 它的发展也给高校声乐教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与重要启示。

一、原生态音乐的学术概念

原生态音乐指的是处于原声状态、未经过任何艺术形态加工的音乐。这种音乐源自民间, 在乡野流传多年^[1]。民歌多在农夫、渔夫、船工或农村妇女中传唱, 尽管歌词大多由乡野农夫口头

创作, 但并非简单的词句拼凑, 而是蕴含一定韵律。原生态民歌生动展现了人民的生活形态, 真实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的生活面貌, 同时表达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与赞美之情。其语言在传唱过程中不断被后人改进发展, 曲调愈发精美动听, 歌词也愈发朗朗上口^[2]。如今, 原生态音乐已成为具有极高艺术研究价值的艺术精品。音乐种类发展至今, 根源皆来自民间音乐。我国原生态音乐分布广泛、种类繁多, 目前流传较广的有陕西民歌、山西西北山曲、新疆十二部卡姆、甘肃一带的花儿、江浙吴歌和各种客家山歌等。此外, 内蒙的长短调牧歌、河套的民间歌曲流传也很广, 四大唱腔



更被誉为原生态民歌的代表。

二、原生态音乐之艺术价值探讨

(一) 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原生态音乐存在于不同地域的不同时期,它是各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既展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艺术特色,也是对整个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状况的生动刻画。原生态音乐融入人们的生活,它不只是人们劳动时的点缀,也是人们阶级斗争中的有力工具。原生态音乐的出现使混乱的音乐文化市场有了新的生机。作为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原生态音乐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3]。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提升,对本土文化的情感愈发深厚。作为活态文化的原生态音乐凭借其纯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并不断发展壮大。而原生态音乐的发展也体现了民族音乐的进步,充分展现了民族音乐独特的艺术魅力,让更多人对民族音乐有了新的认知和感悟^[4]。

(二) 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中国向来是文明大国,原生态艺术作为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更是一个民族精神千年的沉淀。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发展关乎一个民族的兴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在现代社会发展背景下,弘扬民族精神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5]。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加速的今天,世界各国在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的同时,也更加重视本国的传统文化。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音乐在我国数千年的民族文化底蕴中熠熠生辉。音乐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象征^[6]。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历史悠久,作为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原生态音乐不仅反映了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态势,更是我国民族音乐的精髓。发展原生态音乐能够弘扬民族音乐精神,加强人们民族精神的培育,提升人们的民族自豪感,进而更好地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让民族音乐精神代代相传。

(三) 传承了民族音乐精神

原生态音乐种类繁多,据相关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被收录的民歌约有三十万首,器乐有二十多种,戏曲有三百六十多种。新时代的原生

态民族音乐更具时代特点,其发展前景也愈发广阔。对于原生态音乐来说,听众基础越广泛,它就越能展现出独特光彩和魅力^[7]。原生态音乐的出现丰富了民族音乐教育,让更多人开始了解并喜爱民族音乐。特别是在当今音乐演唱趋于同质化、表现形式单调乏味的情况下,原生态音乐给音乐爱好者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原生态音乐源于自然又融入自然,随着民歌数量逐渐减少,口头传唱已难以完整保存原生态民歌。为了更好地传承民族音乐文化,发扬原生态音乐的艺术魅力,我们把原生态音乐纳入音乐教育内容进行传承,通过录音、文字记录等方式收集整理各民族的原生态音乐,并妥善保存,再通过出版发行让更多人了解和传播原生态音乐,使民族音乐文化得以传承^[8]。

三、原生态音乐对高等教育声乐教学的启示

作为我国传统音乐类型之一,原生态音乐在高校教育里有着重要的地位。随着音乐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音乐的艺术价值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特别是对于具备丰富社会功能的原生态音乐而言,其兴起和传承对高校的声乐教学更具有十分关键的启示作用。

(一) 高校注重音乐教育的文化价值

在原生态音乐的艺术价值受到重视的同时,各大高校也开始把原生态音乐纳入音乐教学工作中,教师积极引导开展原生态音乐的研究和探索,并在课堂上教授原生态音乐,以此引导学生传承原生态音乐^[9]。因为原生态音乐源自民间,为了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高校不仅让音乐专业学生学习原生态音乐,还在各年级和各专业编写了原生态音乐教材,同时,高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让原生态音乐能面向更多学生,使学生更广泛地传播原生态音乐。比如举办原生态音乐文化节、开展原生态音乐表演等,这些方式有助于高校学生更快地接触和了解原生态音乐,树立原生态音乐保护与传承的意识,让学生从原生态音乐中了解中国民间文化,进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

(二) 提升学生的音乐想象力和创造力

原生态音乐在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唱法和表现形式,其内容的传承和发展愈发重要^[10]。高校除了要将原生态音乐纳入日常声乐教



学活动外,还应对原生态音乐文化进行实地考察,正确评估原生态音乐的价值,再制定相关教育方案。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音乐教师的职责不仅体现在专业知识教学上,还在于善于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乐感和创作能力。原生态音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后人对原生态音乐的加工使其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后人的创作是在现有音乐基础上进行的,创作积累得越多,越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尤其是在高校声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利用原生态音乐的发展进行教学,让学生在欣赏原生态音乐时,发挥自身想象力对音乐进行再创作^[11]。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对音乐知识的理解能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音乐创作能力^[12]。

(三)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文化精神

音乐本身极具艺术魅力,是传承千年的精神文化,而原生态作为音乐文化的创作素材之一,正以丰富多彩的原生态艺术形式丰富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原生态音乐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和生活习惯,保护原生态音乐实际上就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化^[13]。作为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交流与融合的成果,原生态音乐无论是在体裁上,还是在音调风格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教育学家李岚清曾说过,要发展民族音乐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民族音乐修养^[14]。特别是对于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当代音乐教育更需要弘扬和发展原生态音乐,让中国民族文化得以稳固。如今的原生态音乐已不只是民族历史的延续,更多的是原生态艺术文化的一种发展^[15]。

四、结语

原生态音乐本质上是对文化历史的一种传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如实反映了我国整个历史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凭借自身独特的艺术特质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而原生态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对我国高校声乐教学有着重要的教学启发和教学作用。身为音乐教育工作者,我

们更应在实践中把原生态音乐发展并完善,借助原生态音乐推动高校声乐教学,让我国民族精神得以弘扬,让音乐教育事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樊祖荫. 原生态音乐的文化价值与当代传承[J]. 中国音乐学, 2015(3): 5-12.
- [2] 杨民康. 论原生态音乐的“本真性”与“活态性”特征[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8(2): 45-53.
- [3] 张天彤.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的原生态民歌保护研究[J]. 音乐研究, 2020(4): 89-97.
- [4] 田青. 原生态音乐的审美价值与现代意义[J]. 人民音乐, 2017(11): 62-67.
- [5] 乔建中. 中国原生态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及其文化内涵[J]. 中国音乐, 2019(3): 112-120.
- [6] 萧梅. 从“声音景观”看原生态音乐的文化生态价值[J]. 音乐艺术, 2021(1): 78-86.
- [7] 王耀华. 原生态唱法对高校声乐教学的启示[J]. 音乐探索, 2016(4): 32-41.
- [8] 刘辉. 民族声乐教学中原生态音乐元素的运用策略[J]. 中国音乐教育, 2020(5): 102-111.
- [9] 赵振岭. 高校声乐教学中“原生态”与“学院派”的融合路径[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19(2): 88-96.
- [10] 管建华.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原生态音乐资源开发[J]. 中国音乐, 2018(4): 67-75.
- [11] 谢嘉幸. 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与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的互动研究[J]. 音乐研究, 2021(3): 45-54.
- [12] 张礼仁. 西南少数民族原生态唱法在声乐教学中的实践探索[J]. 歌唱艺术, 2017(7): 72-78.
- [13] 王红星. 云南艺术学院原生态音乐教学体系建设研究[J]. 民族艺术研究, 2020(4): 33-41.
- [14] 石惟正. 原生态唱法与美声唱法的比较研究[J]. 天籁, 2019(3): 112-120.
- [15] 金铁霖. 民族声乐发展中对原生态音乐的吸收与创新[J]. 中国音乐, 2018(2): 58-67.

作者简介: 吴阿妮(1989-3), 女, 山西大同人, 硕士,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音乐艺术。